

SHENZHEN LAWYERS



深圳律师

非常视线 专业见解

王荣书记寄语深圳律师：

要让律师成为一流法治城市建设的生力军

2014年2月25日，深圳市委王荣书记在深圳市律师协会调研时，充分肯定了律师协会和广大律师为深圳城市发展、法治建设作出的重要贡献，寄语深圳广大律师增强社会责任感，加强自律和诚信建设，不断提升综合素质，在深圳推进一流法治城市建设进程中当好生力军。

合伙制律师事务所20年

“1+1”法律援助半年印象



法人
FAREN MAGAZINE

NO. 50

2014年第1期 深圳市律师协会主办
法人杂志社协办

市律协切实为会员办实事、谋福祉

全市执业律师享受重大疾病保险

近年来，我市律师罹患重疾、猝死的案件比例逐渐上升，因此面临沉重的经济负担。对此，八届律协修改了《深圳市律师救助基金管理办法》，对患重病或非履行职务时发生伤亡事件给予的救助金上限从20000元调整为30000元。

同时，八届律协借鉴发达国家律师业的成熟经验，结合广大律师代表意见，出资为全市注册执业的律师购买重大疾病保险。2013年8月1日起，全体律师享受包括恶性肿瘤等35种重大疾病在内、保额10万元的保险，保险期间为2013年8月1日零时至2014年7月31日二十四时一年期，其中包括30天等待期。被保险人确诊初患35种重大疾病之任一种，即可获全额给付，无需医疗发票，不与其他医疗保障冲突。

重大疾病保险理赔办理流程如下：

◎报案并告知

被保险人不幸身患重疾时，应立即拨打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报案电话，并告知深圳市律师协会保险联系人。

◎申请并提交资料

领取保险金申请书（可从深圳律师网下载）；

被保险人身份证复印件；

理赔申请人银行卡复印件；

律师执业证复印件（照片页和最新年度考核盖章页）；

病历或出入院记录（原件）；

病理切片检查报告或二级及以上医院出具的诊断证明书等相关检查报告（原件）；

保险公司认为应当提交的其他材料（原件）

◎资料递交保险公司

工作人员审核材料后受理申请，五个工作日内将材料递交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保险公司理赔

保险公司接到申请后，不属于保险责任范围的疾病由保险公司通知深圳市律师协会和被保险人，属于保险范围内的则由保险公司按照协议的有关规定，在核实后的15-30个工作日内予以理赔。

保险报案电话：0755-25942403 24小时客户服务电话：95522

办理部门：市律协秘书处维权部（0755-83025978 83025300）

深圳市委王荣书记视察律师工作

指出要让律师成为一流法治城市建设的生力军

“律师是完善法治、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我代表市委向深圳八千律师朋友们表示慰问。”2014年2月25日上午，市委书记王荣在律师协会调研时，寄语深圳广大律师增强社会责任感，加强自律和诚信建设，不断提升综合素质，在深圳推进一流法治城市建设进程中当好生力军。

王荣书记和市领导蒋尊玉、李华楠一道，听取市司法局局长陈志刚，市律师协会会长张勇、党委书记张丽杰有关情况汇报，就支持成立前海国际律师培训学院、打通优秀律师进入公检法队伍渠道等问题进行了探讨。目前，深圳律师人数近八千人，规模、水平、每百万人拥有律师数均处于全国前列。大到国际并购，小到婚姻纠纷，深圳人都会委托律师。去年，深圳民商事案件律师代理率超过60%，刑事案件代理率约55%。

王荣书记充分肯定律师协会党建、协会组织工作有创新、有特色、有亮点，成效显著，感谢律师协会和广大律师为深圳城市发展、法治化建设作出的重要贡献。王荣书记说，新的发展时期，中央高度重视法治建设，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纳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领域。作为改革开放先行地，深圳在法治化建设上任务更为迫切，市委把法治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一大突破口，以法治化来营造“安全有序可预期”的发展环境，努力使一流法治成为经济特区新优势。

王荣书记表示，广大律师工作在一线，接触到社会各个层面，是专业人士也是社会工作者，更是推进法治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希望深圳律协、各律师事务所和广大律师齐心协力，积极发挥正面引导作用，不断推进我市法治化进程。一是更好地发挥律师的作用，创造性地做好律师工作，为加强法治建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服务。二是提升律师行业公信力，不断推动涉法涉诉信访工作纳入法治轨道，在维护稳定、构建和谐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三是加强队伍建设，加强行业自律，增强社会责任感，当好诚信的表率，积极发挥正能量。四是大力支持律师协会作为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律师协会又好又快发展，为建设现代化国际化先进城市服务。

（来源：《深圳特区报》）





法人

主办：深圳市律师协会
协办：法人杂志

粤内登字B11277号



本刊随《法人》杂志赠阅发行

编委会 主任	张 勇
编委会 成员	蔺晓青 梁建东 郑德刚 林昌炽 杜艳芝 尹成刚
主编	林昌炽
副主编	杜艳芝 王 红 高中明
栏目编辑	周争锋 俞 飞 陈 伟 杨新发 舒 笑 兰 天 陈 夏 张春丽 贺 鹏 刘晓莹 赵 佳 周洪磊
编辑	0755-83025728 83025789
美编	0755-83025177
电话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4001号
传真	时代金融中心20楼
地址	518048
邮政编码	shenzhenlawyers@163.com
电子信箱	

视线 VIEW

P4-P5 八届律协副会长述职报告

- ◎ 勇担责任 促进发展
- ◎ 开拓创新 突出重点
- ◎ 让我们共同为深圳律师业的发展尽心出力
- ◎ 以特区立法保障律师有尊严地执业

P6 自律是律师行业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

——专访市纪委监委派驻二组组长、市司法局纪委书记林开榕

热点 HOTSPOT

专题：合伙制律师事务所20年

P8 深圳律师：敢为天下先

P9 论合伙制律师事务所管理创新



P12 只有丢掉自己才能找到自己

P14 20年律师事业与未来之路

P16 以合伙人股份化改革促进律所有效治理

P18 律师事务所发展之思考和探索

论道 DISCOVERY

P19 每一个人都是法治城市建设的参与者

P22 从“全额宝”遭遇“余额宝”
看商标的独创性

实务 PRACTICE

P24 中港婚姻及家事法探析

P27 代持股股权转让若干所得税问题

P29 浅析家用汽车“三包”规定

拍案 CASE AND EXAMPLES

P31 企业知识产权法律风险之防范

P34 从张昌年案反思我国职业病
诊断与保障制度

P36 浅析迟延履行非主要债务能否解除合同

人物 PROFILE

P39 “1 + 1”法律援助半年印象
——2013年深圳志愿律师侧记

生活 LIFE

P42 春在和风细雨中

P43 布拉格的两张名片

P44 读书时代：2013十大法治图书



资讯 INFORMATION

八届律协副会长述职报告

勇担责任 促进发展

——蔺晓青副会长述职报告

本人担任市律协副会长，并分管纪律惩戒、执业纠纷调处、公益法律服务、实习人员考核管理等工作。根据协会《章程》第62条之规定，现就本人履职情况进行汇报。

纪律委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出台实施全国首部律师职业道德守则——《深圳市律师协会职业道德守则》，为珠三角乃至全国律师业提供参考；纪律委通过修改工作规则、编写出版《深圳市律师执业警示录（二）》、建立律师诚信档案等途径，积极提升律师队伍自律水平；市司法局与理事会积极互动，树立“两结合”管理体制典范。

执业纠纷调处工作坚持“调防结合，以防为主”的方针，探索电话调解、开庭调解、案例调解、第三方调解等多种模式；开展律所内部机制及纠纷处理调研并修改相关工作规则；编写该委员会首部著作——《深圳市律师执业纠纷调解案例汇编》，调解工作取得良效。

以组织参加“1+1”中国法律援助志愿者行动为重点开展公益法律服务。2013年度，我市8名律师参加“1+1”法援工作，深圳为全省参加“1+1”行动人数最多的城市；成立“安防行业公益法律服务团”；搭建“深圳市律师协会、深圳市图书馆公益法律平台”；与福田区维德法律服务中心等单位共同举办“深圳公益法律交流研讨会”，拓宽律师服务领域。

实习考管委继续严把“入口关”，通过增补委员、深入各律师事务所抽查调研、召开实习人员座谈会等方式，完善面试考核工作规则，确保相关工作有序进行；律师事务所及实习人员对实习工作高度重视，第二期实习人员结业考试无一例违纪情况发生，新执业律师综合素质显著提高。

时光如梭，在理事与副会长的岗位上服务六年来，我始终奉行一个理念：律师，在做好自身业务的同时，还应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与行业责任。六年任期已届满，但我为大家服务的信念始终未改变，我对律师行业充满了感情，从内心渴望我们的行业有更好的发展，我将继续关注行业建设，始终不渝地承担为行业发展服务的责任。

开拓创新 突出重点

——梁建东副会长述职报告

本人参与三届协会工作，为行业自律、规范和创新建设倾注了大量的心血，现择重点工作汇报如下：

深圳首家律师培训中心挂牌。建立律师学院是几届律协共同推进的重点工作，2013年12月28日，深圳市律师协会、香港律师会和清华大学法学院、清华深圳研究生院四方共同签署合作框架协议，挂牌成立“前海国际律师培训中心”。培训中心将肩负发掘律师行业未来领军人物、培养高端法律人才的重任。

倾力打造律师行业领军人才。“十年千人”培训计划进入第三个实施年，为鼓励青年律师向专业化方向发展，青工委紧抓房地产开发这一城市建设的新热点，适时举办第三期房地产青年律师研修班，进一步从知识结构、业务技能、专业视野及社会责任感等方面提升青年律师核心竞争力，倾力打造律师行业未来领军人才。同时，探索在青年律师推行“深圳好律师”导师制度，破解入门难、求学难、提升难的困境。

紧抓律师业务国际化发展机遇。国际港澳台委员会通过举办“深圳律师国际化发展研讨论坛”、组织律师赴新加坡、台湾、美国调研律师执业生态环境、编写《域外律师执业生态考察》等，积极推进深圳律师国际化发展；积极参与司法部关于“深港律师事务所联营办法”起草小组工作，为联营所的创立建言献策。

探索律师职业培训新模式。为进一步促进律师专业化分工、推动专业化发展，业务发展委和各专业委员会加强队伍建设，引用“听诊式”等先进培训模式；加强对外交流，将专家引进来，让律师走出去，跨专业、跨行业、跨领域开展业务交流与培训，全面提升深圳律师专业水准；重视专业成果的提炼，出版6本实务专著，打造深圳律师专业品牌。

做好律师代表大会服务工作。会员代表委负责大会期间的组织及会员代表资格审查工作。代表大会及代表的推选工作事关行业的发展及律师社会职责，委员会积极履行职责，确保代表大会顺利召开。

各位同仁，两年来，本人的工作得到了上级领导的关怀和业界同仁的广泛支持。在此，我谨向大家表示真诚的谢意。

让我们共同为深圳律师业的发展尽心出力

——郑德刚副会长述职报告

担任市律协副会长两年来，的确有不少感悟。我分管的四个委员会在过去的一年里做了大量的工作，具体如下：

主持起草《深圳市律师协会章程（修改意见草案）》。修改小组历时9个月，召开20余次会议，为修改工作提供建议，完成《深圳市律师协会章程（修改意见草案）》并获深圳市第八届律师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高票通过。

律师发展战略与文化建设委员会组织召开“建设一流法治城市”论坛，探讨法律人如何形成合力为法治城市建设服务；开展“深圳律师职业精神和职业形象有奖征集及问卷调查”，提炼深圳律师职业精神，并调研策划深圳律师文化节活动；与文体委、业务发展委、纪律委、宣传委组织开展关于政府购买法律服务市场的调研活动并形成统筹报告。

女律师工作委员会秉持“传承、传情、提升”的工作理念，长期志愿为妇女服务，荣获“深圳市三八红旗集体”称号；与市妇联、青工委、宣传委联合举办演讲比赛，彰显女律师良好形象；主办“深圳律师业务开拓发展30周年”论坛，回顾三十年风雨历程；加强与兄弟律协及香港妇联的交流，开启工作新思路。

律师事务所管理指导委员（小型律师事务所发展中心）会坚持与时俱进、求实创新的工作理念，组织研讨律师团队化管理、风险监控等问题；对全市30家小型律师事务所进行调研并形成调研报告；组织编写20万字的《律师事务所精细化管理手册》并将在法律出版社公开出版；编写《常年法律顾问合同》等30多个示范文书；积极完成贫困县律所帮扶任务，为梅州、韶关等地律所培训。

文体委员会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小品《平安广东你我他》在省司法系统首届文化艺术节备受好评；在我会主办的第二届“穗深惠律师杯”羽毛球混合团体赛中我市律师获得亚军；组织参加粤港澳律师运动会、粤琼律师羽毛球友谊赛，深圳律师在多个团体和个人项目中表现优异，助力省代表团勇夺桂冠。

一年来，我的工作得到了诸多同事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我表示感谢。希望在今后岁月里，我们共同为律师业的发展办实事，办好事。

以特区立法保障律师有尊严地执业

——林昌炽副会长述职报告

两年工作匆匆而过，回首往事，不胜感慨，现择其要点总结之：

全面推进法律职业共同体建设。与公、检、法建立常态化工作联动机制，分别与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签署备忘录，就重大问题定期互访及会商；与市中级人民法院签订共建诚信诉讼体系公约、集约管理合作协议，联合举办共促司法公正论坛；推进法院开辟“绿色通道”，破解“安检门”困扰；加强与公安机关工作交流，各看守所切实改善律师会见条件，尤以市第二看守所及宝安看守所改进成效显著。

积极开展《深圳经济特区律师条例》修改工作。《条例》修改工作于2012年底正式启动，修改小组高度负责，力争从加强行业管理、行业自律、律师维权、业务发展等领域从立法上得到重大的突破。经过反复研讨及修改，目前已将修改稿呈上级部门审核。

个案维权效果显著。维权委对维权案件迅速介入，落实到人，稳妥解决，及时答复，我市律师在异地被指控犯罪，经市律协会长办公会研究讨论、维权委倾力相助，当地检察机关决定不予起诉；受理的27宗案件均已办结，有效维护我市律师的合法权益，提升我市律师对维权工作的认同感。

打造深圳律师的宣传平台。以《深圳律师》杂志等为平台，壮大编辑队伍，拓宽约稿渠道，提升稿件质量；聚焦社会热点问题，分别就“深圳‘1+1’法援律师”、“北京流浪猫伤人案”、“法官和律师共促司法公正”、“刑辩律师群体”等专题进行研讨；扩大发行范围，提升律师地位与社会影响力，展示深圳律师专业水准与职业形象。

参加公诉人与律师控辩大赛，成绩优异。宣传委联合业务发展委、刑委会组织参加由省检察院、省司法厅、省律协共同举办的第三届广东省公诉人与律师控辩大赛，我会获团体亚军，为历年参赛最好成绩。

强化财委职能作用。科学制定年度预算，提高经费使用效率；调整协会定期存款，实现资金增值；在完善律所财务管理的基础上，实现律师税收制度的平稳过渡；根据协会总体安排，积极推动为全市律师购买重大疾病保险工作。



【行业观察】



自律是律师行业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

——专访市纪委监委派驻二组组长、市司法局纪委书记林开榕

文 本刊编辑 贺鹏

1月22日，天气晴朗，和煦的阳光为南国深圳微冷的冬季带来丝丝暖意。这天下午，深圳市纪委监委派驻二组组长、市司法局纪委书记林开榕，依约在天平大厦23楼办公室接受本刊记者的采访。这位法学科班出身、拥有律师任职资格、在政法战线工作20多年的纪委书记，与记者从明媚的阳光谈到了法治之光，以及律师在法治晴空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现录其要。

记者：您就任市司法局纪委书记一年多了，上任不久就到市律协调研，还开展了律师管理专题调研。可以说，您对我市律师行业的情况是很熟悉的，请您谈谈对我市2013年律师纪律工作的看法好吗？

林开榕：好的。市纪委监委派驻二组是2012年10月17日正式成立的，10月22日进驻市司法局。10月29日，我就率队到市律协调研了。去年1月9日，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丘海同志率市纪委有关领导到市司法局调研，对强化律师行业管理提出了较高的要求。由于竞争激烈、律师与执法人员工作关系密切等原因，律师行业总是让人联想到“金钱案、关系案”等腐败问题，社会也常常在拷问律师行业的公平正义与良知。为了全面了解我市律师行业情况，查找不足，促进廉洁自律，我们花了两个多月时间，对全市律师管理情况进行了专题调研，又与市律协有关领导一起，到香港大律师公会和香港律师会考察交流，撰写的调研报告得到上级纪委和市纪委的充分肯定。为了推进调研报告所提建议的落实，我们与市律协有很多互动。这个互动的过程，更加密切了我们之间的关系。也是基于我们对市律协工作的了解和肯定，我们决定邀请各位特邀监督员到市律协召开座谈会，让他们近距离感受特区律师的风采。

关于对我市2013年律师纪律工作的看法，从我了解

的情况看，深圳律师行业整体的纪律状况是比较好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投诉较少。2013年，市纪委监委派驻二组和市司法局纪委只接到有关律师违纪违法投诉3起，一起查实，一起因诉讼中止，一起经查失实。查实的某律师违规问题，派驻二组核查后提出了处理意见，市律协给予训诫处分。作为近八千人的律师队伍，这样的低投诉率是不容易的。

二是市律协强化了纪律规范。第一是将“纪律与惩戒委员会”更名为“律师职业道德与纪律委员会”，并修改了工作规则，把职业道德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层面，将律师的失德行为名正言顺列入监管范围。第二是调整纪律委员会的组成架构，聘请10名社会人士担任委员，强化社会监督力量。第三是正式公布实施全国首部律师职业道德守则——《深圳市律师协会律师职业道德守则》。应该说，这一年来，市律协在强化纪律规范方面做了很多卓有成效的工作。

三是强化警示教育。集中体现在编写出版《深圳市律师执业警示录（二）》，律师人手一册，起到了很好的警示教育作用。

四是律师纪律查处工作有所创新，增加社会人士的广泛参与。

总的来说，市律协一年来在纪律管理方面的工作我很满意，取得这样的成绩很不容易，这跟律协的班子、律协纪委、律协廉政建设委员会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记者：您如何看待《深圳市律师协会职业道德守则》出台的意义？

林开榕：《守则》的出台，是调研组和律师协会多方共同努力的成果。

从作用来说，《守则》的出台，至少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是对全国律师行业有示范作用，二是对深圳律师职业操守的提高有促进作用。

从内容来说，《守则》的道德准则比较高，为何以较高的道德标准要求律师？从世界范围看，律师是专业人士，是社会精英，国际上很多政治家、法官都是律师出身，也有很大一部分律师成为社会贤达，律师团体的作用不可小觑。所以，律师必须站在道德高地，做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做一个具有良好专业知识、敬业精神和奉献精神的人，这是我对律师这个职业的理解。无论是“纪律与惩戒委员会”更名为“律师职业道德与纪律委员会”，还是《守则》的出台，都是对律师道德的高标准界定和引领，有助于我市律师整体职业道德水准的提升，有助于特区律师良好形象的树立。

记者：就《守则》的具体执行而言，您有什么建议？

林开榕：《守则》一共38条，我归纳为“总则和五大关系”，标准高、内容全、范围广。如何把《守则》落到实处，我觉得还可以做三件事：一是制定违反职业道德的处罚细则。《守则》作出的禁止性规定，要有相应的处罚条款。二是市、区司法局应将律师严重违反职业道德的行为，列入监管、处罚范围。三是严肃查处违反《守则》的行为。这样，才能真正发挥警示作用，树立《守则》权威，实现《守则》价值。

记者：十八大提到，律师要作为司法公正的实践者和推动者。但打铁还需自身硬，您认为律师应当如何加强自身建设从而赢得党和政府的信任？

林开榕：行业自律的基础还是在于律师自身的自律。如果每位律师都能够提高自我约束的意识，这对律师良好形象的树立会有很大的聚合作用。怎样促进律师自律？我有四句话：知之，守之，盯之，惩之。

具体来讲，首先，要让律师知道有哪些规范，哪些是通电的高压线，是不能碰的。据悉，市律协将在今年的律师培训中，增加职业道德与执业纪律课程，这是非常好的做法。我们不能不教而诛。第二，知道了就要遵守。律师作为法律人，必须成为遵纪守法的楷模。第三，就是强化监督。司法行政机关要强化管理，律师协会要强化行业监管，律师事务所要强化内部管理，更重要的是强化社会公众的监督。律师散落在社会各个角落，如何才能实现有效监督？一个有效办法就是建立律师诚信网，只要律师有违纪违规现象，就必须在律师诚信网公布。在这方面，市律协已经迈出了坚实的步伐，制订了《深圳市律师诚信档案实施办法》，将受到处罚、处分的律师事务所和律师情况、获得市级以上表彰奖励的律师事务所和律师情况上传至“深圳律师网”，设置专栏供社会公众查询监督。我相信会做得越来越好。第四，司法行政机关、市律师协会要依法依规对违法违规律师和律师事务所作出处理。我想，“四之”之下，这个问题必会有所改进。

记者：您认为律师协会在行业自律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是怎样的？

林开榕：基于国际通行的原则和管理效率的追求，律师法设置了律师协会这样一个行业自律组织，它是“司法行政机关宏观管理下的律师协会管理体制”的重要一环，处在一个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通过这些年的运作，律师协会在我市律师行业自律管理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这方面，深圳做了很多有益的探索。改革开放以来，我市律师界创造了多项全国第一，成为全国律师行业改革创新排头兵。我相信，只要我们不断总结经验，不断创新提高，就一定能够把我市近八千人的律师队伍带好，充分发挥律师行业在“三化一平台”建设和一流法治城市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HOTSPOTS | 热点——合伙制律师事务所20年

编者按：20世纪90年代初，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和发展的浪潮中，深圳市率先探索律师制度改革。随着国家关于律师体制改革的文件和规定先后出台，合伙制律师事务所纷纷成立。如今，合伙制已经成为中国律师事务所的主要组织形式之一。让我们跟随律师制度改革的思考者、先行者，追溯律师制度的发展历程，探思律师行业未来发展之路。



【破冰之旅】

深圳律师：敢为天下先

文 广东星辰律师事务所 郭星亚律师

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以后，深圳进入了改革开放的关键时刻。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与发展，我国律师制度的改革迫在眉睫。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律师业与国际接轨的问题亦摆在律师面前。当时我国律师被视为国家公务员，律师通称为“国家法律工作者”。律师在世界各国都是“社会法律工作者”，为何在我国是“国家法律工作者”？当时，律师事务所是“官办”律师事务所。实际上我国当时关于律师和律师事务所的规定与律师的本质属性是矛盾的。作为律师事务所，本身应当是一种社会服务组织，执业律师运用自己的法律知识和技能向社会提供法律服务，应体现“公开、公平、公正”。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时提出，要在本世纪末把律师队伍发展到30万人以跟上经济发展的需要。市场经济需要律师，而当时的律师管理体制限制了律师业的发展。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深圳律师掀起了律师体制改革的浪潮。

我们律师体制改革应使律师事务所与管理部门形成宏观管理关系，总体思想为全面改革，争取一步到位将全体律师转变为不占国家编制的社会法律工作者。具体来说，就是管理好“两块牌子”——律师事务所的“牌子”和律师的“牌子”，主要从六个方面进行深圳律师制度改革。一是国办所进行全面改革，主要从产权界定和律师事务所重新组建两方面进行；二是律师分配方面的改革；三是建立健全律师和律师事务所注册年审制度；四是制定现有律师和司法行政机关开办律师事务所的管理规定；五是允许外地律师事务所到深圳开办分所；六是制定本市有条件的社团、法学研究机构和取得律师资格的人员开办律师事务所的管理办法。

我们的改革思路与时任深圳市司法局局长邹旭东有关律师制度体制改革的设想不谋而合。1993年3月，我们与司法局相关领导等一行4人带着这套改革方案向司法部汇报。然而，中央尚无律师制度改革的指示，我们律师制度

改革的首次探索没有得到支持。1993年6月，在全国司法厅（局）长会议上，新上任的司法部部长肖扬提出，律师制度改革是司法行政改革的重中之重，律师制度改革的主要思想就是把律师业转变为一种行业协会管理，使律师转变成不占国家行政编制的社会法律工作者。这无疑是一个重要讯号。同年8月，由邹旭东局长亲自带队，我们再次进京。律师制度改革的方案摆放在肖扬部长的案头。“就这么干！”部长的回答掷地有声，我们的改革方案得到了司法部的认可。

1993年12月23日，广东省司法厅批准深圳成立首批13家合伙制律师事务所。同年底，深圳合伙制律师事务所由原来的13家发展到30多家，一个合伙制律师事务所新的发展格局形成了，并很快波及到全国各地。在这场改革中，深圳明确了律师的社会身份，改革了律师事务所的性质，撤销了国办所，全部改为直管所，即合伙制律师事务所。为此，深圳市司法局荣立司法部集体一等功。

20年前，深圳首批合伙制律师事务所成立，用实践证明律师制度改革的成功。截至今日，深圳已有四百多家律师事务所，近八千名执业律师。回忆往昔，有三个支持我们律师制度改革的领导值得铭记：一是时任司法部部长肖扬，二是时任司法部办公室主任、现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三是时任深圳市司法局局长邹旭东。他们值得我们感谢，是他们令律师制度改革顺利进行，推动着改革平稳快速地前进。20年来，无论是在业务拓展还是体制改革方面，深圳律师都走在了全国前列，深圳律师不愧为改革开放先行者。

深圳律师不会停止向前的脚步。被誉为“特区中的特区”的前海和前海即将推动的金融改革，将给深圳律师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敢为天下先的深圳律师应抓住这个机遇，在前海开发战略实施中抢占先机，再创深圳律师辉煌历史！



论合伙制律师事务所管理创新

——兼论律师事务所组织形式与律师职业目标的实现

文 中国政法大学 王进喜教授

回顾中国律师行业的发展，特别是律师事务所组织形式方面的发展，我们看到，这种发展的主旋律就是管理创新，并以此解放律师队伍蕴含的社会生产力。当前律师事务所特别是合伙制律师事务所发展所遇到的其他问题，也应当从管理创新角度加以认识和解决。

中国律师制度恢复和重建

1980年《律师暂行条例》颁布，标志着中国律师制度恢复和重建。律师的性质被界定为“国家法律工作者”，国有律师所（法律顾问处）得以较快恢复与发展，我国律师工作从此开始步入正轨。此阶段所确立的律师事务所管理体制是一种行政型的管理体制，这种管理体制体现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符合当时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状况。1980年《律师暂行条例》颁布的首要目的就是为中国律师制度的恢复和重建提供法律依据，并据此建立律师制度恢复和重建的行政支持体系。

不可否认，这种管理体制对迅速恢复律师制度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随着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发展，这种行政管理体制的弊端也不断暴露。一方面，律师行政化管理给司法行政机关带来的极大财政压力，律师队伍发展缓慢，社会法律服务需求与供给之间的供求关系极不平衡；另一方面，律师事务所没有自主权，律师工作积极性不高，缺乏生机与活力，律师行业缺少竞争与发展的源动力。

合作制律师事务所试点改革

1984年10月司法部在《关于加强和改革律师工作的意见》中提出要改革法律顾问处的经费管理办法，凡是收入大于支出的法律顾问处，均可实行“自收自支，结余留用或分成”的经费管理办法。支出大于收入的法律顾问处则可实行“全额管理，差额补助，超收提成”经费管理办法。在此基础上，司法部于1988年6月3日下发了《合作制律师事务所试点方案》的通知，启动了不占国家编制、不

要国家经费，完全由律师养活自己的合作制律师事务所的试点工作。国家力图通过创新律师事务所管理体制，改革经费、编制的管理方式，激发律师业发展的活力。

所谓合作制律师事务所，“是由律师人员采用合作形式组成为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公民提供法律服务的社会主义性质的事业法人组织。”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6条规定，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第8条规定，“城镇中的手工业、工业、建筑业、运输业、商业、服务业等行业的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可见，合作制律师事务所是集体所有制性质的有偿服务性机构，符合我国宪法规定，并受国家法律的保护。

从设立思想来看，虽然合作制律师事务所没有摆脱公与私、姓资与姓社的思想藩篱，但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合作制律师事务所与国办律师事务所相比具备显著的比较优势：首先，彻底改变了行政化管理的旧模式，律师事务所具有高度的自主权。管理方面实行律师会议制，重大问题须经集体讨论决定，充分体现了事务所内部民主管理原则；其次，摆脱了受限制的人事体制，实行全员合同制。优胜劣汰，来去自由，便于实现人员的优化组合；再次，实行效益浮动工资制，打破了律师收入和支出由国家包办的行政化管理模式。充分实现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利益分配机制，克服平均主义的弊端，调动了律师的积极性；最后，提高了律师事务所的自律意识与风险防范意识。因此，合作制律师事务所在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期得到了较大发展。

合作制律师事务所在我国律师业发展中发挥了承前启

后的作用，其历史作用是不能否定的：一是为合伙制律师事务所改革提供了思想准备，并储备了大批优秀人才；二是初步凸显了律师行业的职业独立性，促成了司法行政机关和律师行业管理相结合的管理格局；三是推动了律师从身份到能力的转变，增强了律师职业的荣誉感和成就感。在合作制律师事务所的组织形式下，逐渐出现了人才流向律师事务所的可喜局面。

但是，合作制律师事务所这种制度本身也并非完美，其优势只是相对于国办律师事务所而言的，其本身存在某些天然的制度设计缺陷。集体所有制的产权模式必将因市场经济的蓬勃兴起而渐显疲态。第一，合作律师事务所财产归合作人共有，这种集体所有制的产权模式，极易产生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倾向；第二，由于合作律师事务所的所有专职律师均为合作人，后进合作人必然要与律师事务所现行合作人共享所有权，导致律师事务所规模难以扩大，容易发生高消费、低积累的情况；第三，有限责任的民事责任形式导致律师执业风险与回报失衡，容易产生“公用品悲剧”，并失去吸引潜在委托人特别是大型委托人的魅力；第四，集体所有产权的难以分割性，抑制了律师流动自由，与律师职业应有的独立性不符。

合伙制律师事务所得充分发展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国有律所不再是律师机构的唯一形式，大量的合作所、个人合伙所纷纷成立并开展自己的业务。1993年国务院《关于深化律师改革的方案》的批复中则明确表示：“积极创造条件，鼓励占用国家编制和经费的律师事务所逐步向不占国家编制和经费的方向转变。允许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律师事务所继续实行原有的组织形式……鼓励取得律师资格的人员，在乡镇建立不占国

家编制和经费的律师事务所或者在乡镇法律服务所内从事律师工作”。在此批复的指导下，各地开始了合伙制律师事务所试点。

199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以下简称“《律师法》”）颁布，标志着我国的律师制度迈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成长期。该法确立了国家出资设立的律师事务所、合作律师事务所及合伙律师事务所三种律师事务所的组织形式，并在司法部随后颁布的三部规章中一一明确了三种律师事务所组织形式的责任形式。国家出资设立的律师事务所由司法行政机关根据国家需要设立，并以其全部资产对债务承担有限责任；国家出资设立的律师事务所包括一次性投入开办资产、不核定编制、核定编制并核拨经费等形式；国家出资设立的律师事务所是原法律顾问处的发展，并在原法律顾问处的基础上融合了试点时期合作制律师事务所的特征。合作律师事务所由律师自愿组合，共同参与，其财产由合作人共有；合作律师事务所以其全部资产对债务承担有限责任。合伙律师事务所在试点时期的基础上，在分配及人事上获得了更大的自主权；合伙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自愿组合，财产归合伙人所有，合伙人对律师事务所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合伙律师事务所作为国际上律师事务所通行的组织形式则第一次得到了确认。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1996年《律师法》的出台科学地解决了律师的性质、律师事务所的组织形式等问题，宏观地指导了律师行业的资源布局。其关于合伙律师事务所的规定是一次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制度创新。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这是对律师队伍生产力的重大解放。80年代初，律师的性质被界定为“国家法律工作者”，律师队伍与国家编制和经费绑在一块，抑制了律师队伍的发展。80年代后期的合作制律师事务所试点工作、90年代初期的合伙制律师事务所试点工作都是为了破解这一难题。一个队伍是否有生机、有活力、有生产力，就看它是不是具有吸引力。90年代后期，律师事务所管理体制改革后，一大批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工作人员辞去公职加入律师队伍，表明当时律师队伍蕴含的社会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激发。第二，该法关于合伙律师事务所的规定奠定了未来十余年律师行业发展的基本格局。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应当看到，对这种组织模式的选择，是在《律师法》的框架内进行的，其优势是与合作制律师事务所比较后显现的。这种合伙制律师事务所占主导地位的格局，使律师事务所的结构布局具有一定的单一性，其突出的问题就是以合伙制律师事务所为主要组织形式的模式，使法律服务组织发展遭遇瓶颈。一方面，设立大型律师事务所的制度风险不能克服；另一方面，合伙律师事务所的运作无疑增加了法律服务的成本，导致律师收



► 近期，国内开始关注中小律师事务所建设与管理，这是一种理性回归，伴随着对大型律师事务所发展模式的反思。中国加入WTO以后面临压力和挑战，盲目追求成立大型律师事务所，并不符合行业发展的基本规律，不足以应对法律服务市场开放带来的新问题。我们应该意识到，大型律师事务所与中小型律师事务所各自发挥着不同的功能，承担着不同的社会责任，两者应当是一种互补共生的关系。

费居高不下，低收入人群在获得律师帮助方面存在着现实的困难。

针对上述问题，2007年修正的《律师法》取消了合作律师事务所，明确规定了合伙律师事务所、个人律师事务所、国家出资设立的律师事务所三种律师执业机构组织形式。其中合伙律师事务所可以采用普通合伙或者特殊的普通合伙形式设立，合伙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按照合伙形式对该律师事务所的债务依法承担责任。

90年代初期开始进行的合伙制律师事务所的改革试点是解放中国律师队伍生产力的重要节点。这个改革奠定了我国从90年代初期一直到2007年修改《律师法》这十多年中国律师业发展的基本格局，对整个律师行业的人才资源配置发挥了重要的宏观指导作用。

立法表述也清晰地说明了这一点。1996年《律师法》在法律条文表述上，国家出资设立的律师事务所在先，合作律师事务所和合伙律师事务所在后。这表明国家出资设立的律师事务所为主体，合伙律师事务所仍是少数。而2007年《律师法》的法律条文表述上则是合伙律师事务所在先，个人律师事务所、国家出资设立的律师事务所在后。这说明十多年来，合伙律师事务所得到了充分发展，并成为当前最普遍的律师事务所组织形式，整个律师行业资源配置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观。

律师事务所管理创新

2007年《律师法》在律师执业机构组织形式上新的规定是社会管理创新的在律师管理中的重要体现。其中关于特殊的普通合伙和个人律师事务所的规定，推进了律师事务所组织形式上的改革，突破了过去合伙律师事务所规定的某些局限性，使中国律师事务所不仅能够做大做强，也能够做小做专。

在今后律师行业的发展过程当中，中小律师事务所在我国律师事务所组织形式中具有实现重要政策和补足大型律师事务所局限性的作用和功能。其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解决基层法律服务问题。目前，我国有多种制度保障广大人民群众获得法律服务，如法律援助制度、风险代理制度、司法救助制度等。事实上，最直接有效的方法是降低律师事务所管理成本，从而降低律师服务

成本。与中小型律师事务所相比，大型律师事务所更多的管理层次和结构，管理成本可能占全部业务收入的30%—40%，而此成本将间接地转由委托人承担，故两者管理成本有很大差别。中小型律师事务所的发展，降低了法律服务成本，增加了整个社会法律服务的可得性。二是解放律师队伍生产力。特

别是就个人律师事务所而言，中小律师事务所的发展模式使律师的经济效益与职业责任相辅相成，自律与自利相结合，进一步促进律师队伍的结构性和均衡性发展。三是中小律师事务所的充分发展将为法律服务市场整合创造前提条件。中国法律服务市场整合是司法改革的应有之义，中小律师事务所的充分发展将使律师渗入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为实现法律服务市场的整合奠定了基础。四是中小律师事务所的发展，是大型律师事务所发展的根据。如果没有中小律师事务所在人员、经验方面的成功积累和进一步发展，不可能出现成功的大型律师事务所。

近期，国内开始关注中小律师事务所建设与管理，这是一种理性回归，伴随着对大型律师事务所发展模式的反思。中国加入WTO以后面临压力和挑战，盲目追求成立大型律师事务所，并不符合行业发展的基本规律，不足以应对法律服务市场开放带来的新问题。我们应该意识到，大型律师事务所与中小型律师事务所各自发挥着不同的功能，承担着不同的社会责任，两者应当是一种互补共生的关系。

专业化的成功，关键在于管理。对于律师事务所而言，一是要明确自己的法律服务市场定位，有效实现差异化经营；二是应建立健全适应专业化经营的规章制度，减少经营风险；三是要创造和谐的管理环境，增强律师自律。对于司法行政机关和行业管理者而言，则应采取促进中小律师事务所管理和发展的积极措施，这包括以下五个方面：一是提供有效的公共管理工具，加强引导与监督，并切实执行有关规定；二是提供有效的公众评价与识别平台，建立律师事务所的管理体系和专家认证体系，将差异化管理模式客观化、可比较化；三是采取措施降低中小律师事务所的经营成本；四是加强对律师事务所管理人员的教育培训；五是中小律师事务所搭建合作平台，切实促进中小律师事务所的合作性、专业化发展。

这样，我们才能进一步解放律师队伍中蕴含的生产力，充分发挥律师在社会不同领域的积极作用，促进律师职业目标的真正实现。律师职业目标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为委托人提供服务，二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两者相辅相成。如果律师事务所管理不好，经济效益低下，那么便谈不上律师的高尚职业操守，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也便成了空谈。



【回顾与思考】

只有丢掉自己才能找到自己

——一位老律师眼中的一九九三

文 李淳律师^[注]

20年后的今天，我们应当如何界定1993年发生在深圳的律师制度改革？个人认为，这是中国律师业发展的里程碑事件，是划时代的事件，如何褒扬都不过分。原因之一在于，1993年的律师制度改革确立了律师事务所合伙制，解决了一个重要问题——产权问题。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律师事务所是政府的依附组织、下属单位，无关产权，律师对产权的概念亦是模糊不清的。事实上，产权对法律人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和现实，绕不开也无法回避。可以说，1993年发生在深圳的律师制度改革直击产权问题。

律师体制改革的历史分析

天时。邓小平同志1992年南巡讲话之后，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是一个改革进行得如火如荼的年代。1992年，中共中央十四大明确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律师制度也迎来了根本性的转变。如果说80年代，来深人员致力于“深圳速度”，那么90年代则是另外一群人以深圳为平台，推动国家的改革发展。全国人民沉浸在改革的思索中，思考如何改革、如何深化改革的问题。在这样的大环境、大背景下，律师管理部门、律师从业群体开始思考自己的现状、未来。从这个意义而言，1993年是一个大好时间，90年代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具备了律师制度改革的天时之利。

地利。深圳是经济特区，90年代经济特区“特”的属性是直接凸显的，承载着全国人民深深的期许和厚望，且深圳与香港毗邻，香港的律师制度、律师文化对深圳有重大影响。此外，当时深圳已经开始了产权制度的改革，一批优质企业开始上市，国有企业的产权走向多元化，民营企业 and 外资企业开始崛起，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律师行业自身的产权意识。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具备了律师体制改革地利的因素。

人和。个人认为，90年代，整个律师群体开始产生律师体制改革的迫切需求和深入思考。当时深圳市委、市政府、司法局、律管处的领导对律师体制改革有创新的理念，有改革的勇气，有改革的意识和勇于承担的责任感，这在今天看来是弥足珍贵，这是人和之利，是律师体制改革成功的重要方面。

天时地利人和，内部因素、外部因素相互作用，既符合经济规律，又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这是律师体制改革成功的根本原因。

律师体制改革的历史贡献

对世界律师史的贡献。可以说，律师体制改革是1949年中国建国之后首次在产权问题上与世界接轨，意义不能说不大。律师从国家公职人员、政府人员转变为社会法律工作者、当事人的代理人，直接与西方发达国家接轨，其贡献不可小视。

对中国的贡献。深圳作为律师制度改革的先行者，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为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极大的借鉴意义。1993年至1996年期间，以深圳为开端，全国各地合伙制律师事务所如雨后春笋般成立，律师制度改革在中国全面展开。从这个角度来讲是对国家的贡献。

对社会的贡献。我国社会终于有了以当事人的利益、客户的利益为最高利益、唯一利益的律师群体，既保证了个人的权利和利益不受侵害，也保证了各种经济体制、各种经济形式的企业顺利发展。

对中国律师行业的贡献。律师体制改革，使律师开始关注自己的行业，律师行业开始形式真正的行业自律、行业自治的理念。律师以独立主体的身份出现在民事活动中，享受相应的权利，承担独立的责任。律师的价值在律师体制改革后重塑。

对改革的贡献。律师体制改革推动了体制内的法律服

[注] 李淳律师，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合伙人，曾任第五、六届深圳市律师协会会长。

务人员的改革和改制，推动人们思考是否应当建立公职法律制度、公司法律制度、军队法律制度。后来出现的军队律师、公司律师、公职律师就是在律师体制改革的背景下出现的。

我只是一个受益者

个人认为，我只是律师制度改革的受益者。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不同于一些一直都在深圳执业的老律师。最初，我是招商局的首席律师。我们所里最早的三个合伙人都不是执业律师，即我们体制外的人在体制内组建了一个律师事务所。如果没有1993年发生律师制度改革，我们不会走出体制内，或者说不会那么早走出来。所以我认为我是一个受益者。从受益者角度看受益在哪些方面？我认为有五大方面。

一是价值受益。所谓的价值受益了，就是我终于把自己的价值与律师行业的价值，或者说与国家的价值、民主的价值结合。过去来讲是“两层皮”的，现在终于融合在一起了，成为产业链条中的一个版块、一个组成部分。

二是责任受益。所谓责任受益，最根本的是法律人的责任能够被定性和量化了。过去来讲是定性化多，量化少。那么从律师体制改革后，律师的贡献可以被定量了。

三是战略受益。过去我们从来不考虑我们明年做什么、后年做什么、大后年做什么。而律师体制改革后，一旦你进入律师行业，你要在这种体制中生存，你就必须考虑未来。我对中国律师的思考、对战略的思考也是从那个时代开始。

四是学术受益。我提出了很多的概念，比如法律消费、律师产业化、产业律师、国家发展律师战略等等，大多都是在那个时代、那个环境下产生的。

五是文化受益。所谓文化受益就是律师事务所的成立、发展需要有文化的积累和沉淀，一个有文化底蕴，有共同文化背景的团队才具备一定的竞争力。

1993年是律师业发展的第二个春天

我们要感恩那个伟大的时代。个人认为，律师业发展的第一个春天是1980年到1988年，1993年是中国律师制度恢复以来律师业发展的第二个春天。如果说第一个春天叫激情燃烧的岁月，那个第二个春天就是如火如荼的岁月。

我们要感恩那些伟大的人物。我认为第一要感恩的伟大人物是邓小平。第二要感恩的是那些为深圳律师改革奋斗、努力的群体，比如说时任的司法局主管局长、律管处处长、其他主管司法的领导和当时律师协会的负责人。我认为他们都是伟大的人物。第三要感恩的是我们的同行，我们的前辈律师，那些参与1993年律师体制改革的律师。今天我们用客观的、理性的观念去评价，我认为这些前辈

律师在1993年丢掉、放弃了许多东西。人最难的是“丢掉”自己。我常常讲“丢掉自己才能找到自己”。那个年代我们前辈律师是丢掉自己，最后找到自己。看着那些前辈律师的背影，我看到他们的伟大。虽然我也是年长律师，但是在这一点上，我是受益者，所以我更多的是一种感怀和感恩的心态。

二十年之后的思考

第一个思考，就是这二十年，我们发扬了什么，我们弘扬了什么，我们继承了什么，我们传承了什么。今天我们仍然需要思考，需要理性、冷静的思考。这二十年，我们律师业发展得很快，但我们思考不多，成果更少。我所说的成果更少，是与人们对律师的期望对比而言。所以应该说，我们首先要学会思考。

第二个思考，就是我们要继续探索。我们探索的使命没有结束，今天探索的力度与深度有别于以往任何时刻、任何时候。

第三个思考，是我们要战略意识。要从战略的角度、从整个行业的角度去衡量行业的发展，甚至可以说从律师行业战略规划的角度去思考，而不仅仅只是从一个深圳律师的角度。

第四个思考，就是产业定位。我们应当思考，如何把律师发展为产业及如何创设律师产业定位的环境、基础条件。

最后，深圳是中国的深圳，是全球经济环境下的深圳。我们不管思考、探索还是作战略规划、产业规划都要站在全球经济的高度，进行全球战略布局。这样才能无愧于1993年开启的一个伟大时代。我们都是传承者，我们都是承继者，历史不能在我们这里终结。我们确实要对那些创造辉煌的人表示一种敬重和感恩，但不是止步于此，我们也要为后来人创造更好的时代，所以说我们深圳律师应该有更大的作为。对此，我很有信心。因为深圳律师是有学养、有修养、有责任、有抱负的群体。作为一名有三十一年执业经验的老律师、已卸任几年的老会长、学者型律师，我愿意成为这个队伍中的一员，为深圳律师业的发展添砖加瓦。





【思考与展望】

20年律师事业与未来之路

文 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 高树律师

作为我国首批成立的合伙制律师事务所的负责人，回望律师业发展的20年历程，我首先想到的是，我们是一批幸运的人，历史率先选择了我们进入刚刚起步的法学殿堂，时代又把我们推到了律师体制改革的前沿，我们有幸亲身参与并见证国家的民主与法制建设，追寻和体验法治的社会价值和实践含义，我们有幸把法律职业当成我们的事业，成为我们的安身立命之本。20年风雨岁月已然成为历史，今后事业仍离不开有思想的谋划，矢志地践行和不懈地坚持。

随着我国改革纵深发展和社会治理深度转型，我国律师业必将迎来前所未有的格局性变化。对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而言，这既是机遇亦是挑战。可以预见，今后律师业市场化、专业化、规范化、国际化程度将越来越高，优胜劣汰之下，强者愈强，弱者越弱将成为常态。对于已经走过20年发展历程的合伙所而言，历史的沉淀和积累是一个竞争优势，但是体制和机制相对落后、观念陈旧、难以找到新的专业突破口、部分合伙人和律师疲态已现、律师所发展后劲不足等问题成为律所可持续发展的瓶颈。未来的20年或者更长时间，律师事务所将面临更加沉重的压力和更加严峻的挑战。

法治建设的生力军

律师应成为法治建设的生力军，在推进国家法治化进程中发挥积极的作用。这是一个法治兴起的时代，一个伟大的时代。每一名律师都可以通过具体个案的努力，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同时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和法律的尊严。律师的执业活动为国家的法治建设提供了具体的、专业的法治样本，我称之为律师的微观法治体系。律师承办的每一个案件既对应一种权利义务关系，又体现了一种现实社会生活。律师通过执业活动，不断改写和完善着新型的社会生活体系，一点一点地增加法律的厚度。应推动政府对律师参与法治建设作出战略规划，构建方便律师发挥作用的平台，使律师找到参与法治建设的突破口和路径，广大律师也应该以此为契机，

主动参与、积极有为，以体制创新和专业创新为突破口，努力推动法治化进程。同时，对律师倡导、助推法治城市建设的实践案例进行总结汇编，加以宣传和推广，以实现行业发展与法治进程相结合的战略目标。

别树一帜，推陈出新

改革创新，推进律师事务所可持续发展。律师事务所可持续发展已日渐成为律师业发展迫切而重要的议题。20年前，我国律师事务所合伙制改革极大地焕发了律师业的生命力，推动了我国律师业蓬勃发展。但目前合伙制律师事务所发展中，其体制改革和制度构建渐呈滞后态势，主要表现为大多数律师事务所还停留在传统的自给自足、作坊式的管理模式和运营模式。在人情和人格聚合不足以支撑律师事务所长远发展的今天，律师事务所在体制创新方面无所作为或无处适从，故包括优秀律师事务所在内，一些律师事务所呈现出制度松散乏力、管理人才断层、协议和章程不完善等问题。虽然业内有一些律师事务所在体制改革方面进行了大胆尝试，并一定程度地推动了律师事务所管理模式创新，局部带动了其他律师事务所的发展，但从总体来看，敢于尝试的律师事务所数量不多，且多数为总所在北京、上海的深圳分所，多数本地所的管理模式和业务模式还在原地踏步。

律师事务所管理模式和业务模式创新对律师业的发展至关重要。我认为当前律师事务所面临着急需破解律所管理与发展瓶颈的关键时刻，应从三个方面进行突破。第一个方面，关注每一个律师的生存状况和发展中遇到的问题；第二个方面，应该重点研究和探讨如何打破传统管理和作业方式，探讨新的治理模式；第三个方面，应加快以所带所、业内资源整合、所与所合并等战略构建的步伐。

培育高端人才，提升创新能力

重视培育高端专业能力和提升专业创新能力。专业人才是决定业务发展和案源开拓的重要因素，也是决定律

师事务所竞争能力的关键要素。传统业务的改变和新型业务的推出，意味着律师业朝着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不断转变。社会专业分工的细化对律师专业创新方面，要求律师在业务技能和执业方式两方面不断推陈出新，推动律师向专业、高端、精英方向发展。从律师事务所发展的角度，其应逐步打破现有的专业部门粗线条设置和简单运作模式，由研发、开拓、业务实操一体化的法律研究和实务中心模式取而代之。律师事务所行政部门与业务部门适当分离，并赋予业务部门更多自主管理与运营的权限。这些方面正是华商所正在尝试推行的改革措施。此外，华商所大部分律师都是所内自行培养的青年律师，华商所成立了青年律师工作委员会，为青年律师提供更多的学习、培训、交流和实战的平台，为华商所可持续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从律师业发展的角度，则应大力提倡和鼓励律师事务所和律师进行业务创新。具体操作方面，律师事务所内部可以颁发业务创新奖，鼓励业务创新；律师协会则可增设业务发展与专业创新委员会，统筹和协调其他专业委员会，助推各专业领域进行业务创新。

政府的指引和监管不可或缺

在律师业市场化程度较高、律师自治意识较强和律师自治管理形式日趋完善的今天，许多人认为政府对律师业可以放手了，对此我持不同观点。今天的律师业要实现更高层次的市场化和规范化运作，政府的指引和监管作用同样不可或缺。但政府的指引和监管作用方式应有所转变，具体表现在三方面。第一，在律师战略布局和发展规划上，政府能进行指引并提供政策支持，并能写进政府的五年发展规划纲要中。第二，在律师事务所的规模化、专业化发展尤其是在向区域所和国际所发展方面，政府能像支持科技经济或总部经济发展一样，出台一些具体指引和监管的政策，在税收、分所设立、人才引进等方面提供指引和支持。第三，在引导律师业公平竞争、规范律师业市场良性运作等方面，政府也应加大监管力度而非放任自流。

寻找新的发展机会和增长点

在行业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困局中找到新的发展机会和增长点。众所周知，深圳律师业发展有其优势之处，一是深圳改革开放的格局、较好的经济发展形势和较稳定的法制环境，二是最早进行了律师体制改革和整体市场化运作，三是率先开始了律师行业民主自治管理模式，这三点都对律师业快速发展有着助推作用。但这些年来，这些优势并没有完全转化为律师行业发展的动力。北京律师业凭借自身的资源优势突飞猛进，上海等地区律师行业发展势头超过深圳，这些都值得引起我们深圳律师认真反思。毫



不夸张地说，深圳律师业的发展开始呈现出局部性疲态，并且这种疲态目前正呈蔓延之势。这将成为深圳一流法治城市建设的软肋和致命伤，如果现在不引起我们注意，不采取相应措施，过不了几年我们深圳律师业或许就该用落后来形容了。深圳为何会面临如此状况？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积极进取、锐意创新的精神在减弱，谋求行业整体发展的集体意识亟须强化。

我认为推动深圳律师业跨越式发展可以考虑从五个方面着手。第一，重新审视和理顺行业发展思路和战略规划布局，树立全市律师业发展一盘棋的思想，找到律师业生存和发展的最佳结合点。要打破律师界“二八”定律，发挥百分之二十高收入律师对其他律师同行的驱动和带动作用，充分地调动全行业往前发展、往高处发展的积极性和能动性，逐步解决百分之八十较低收入律师的进一步发展问题。第二，推动律师事务所制定规模所、品牌所和专业所发展战略，争取在三、五年内通过有机整合、直接合并等方式建成多家有规模、有品牌、专业强的律所，带动律师行业整体规模化、品牌化、专业化发展。第三，提升行业整体发展水平，重点在于实施新型的人才发展战略，不断提升律师行业业务创新能力。尤其重要的是要依托深圳的产业优势和法制环境，引进外向型法律专业人才培养专业的律师团队，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业务创新，发展强项业务。第四，以前海开发和发展为契机，与珠三角及香港、澳门等地区建立更为紧密的律师区域战略合作圈，为律师业发展构建区域合作和跨境作业的平台。第五，倡导社会参与和行业发展相结合的理念，鼓励社会组织共同参与社会法治和社会建设，推进政府购买法律服务计划等。

律师事务所合伙制20年发展的历史并不算太长，但它承载和反映了一代或一群法律人对律师行业发展和法治建设事业难以割舍的感情，体现了法律人身上特有的坚持和坚守。我们所做的一切，不仅仅是为了书写一段历史，更重要的是为了明天律师事业更加美好！



【探索创新】

以合伙人股份化改革促进律所有效治理

文 广东卓建律师事务所 张斌律师 王宏伟律师

基于律师事务所的发展时期，考量发展机遇、人才储备、业务发展等实际情况，律师事务所进行股份化改造不仅能促进所内日常事务民主决策、广泛参与，而且能确保重大决策稳健、高效地执行。通过股份化改革不断增强律师事务所的核心竞争能力，提高其在法律服务业的地位，未尝不是建立规模化、专业化、规范化和现代化的律师事务所的可行之路。

考察美国律师业发展历史和律师事务所管理模式，我们得到有益的启示：一方面，律师事务所的治理思维应当沿循尊重资本要素和权责明晰的理念推进；另一方面，要选择并实行适合自身发展阶段的治理模式。

探索股份化改革

律所股份化治理结构包括三层含义：一是充分考虑律师事务所作为合伙型经济体的“资本性”和“人合性”的双重特征；二是将律师事务所的全部出资额划定或拟定为等额股份，由符合条件的合伙人在限定额度内认购，并根据其认购的股份比例按照同股同权的原则在合伙人会议中集中或分散行使表决权、收益权；同时对于律师事务所发生的赔偿责任，在向过错律师追偿前应按照所持股份的比例在合伙人内部划分责任范围。三是律师事务所晋升新合伙人和引进外部合伙人所应当享有的股份通过其他既有合伙人退伙、除名，其他既有合伙人股份转让以及律师事务所实际或虚拟出资的增资扩股等方式解决。笔者所在律师事务所便在合伙人股份化改革方面进行了探索，具体内容如下：

一是确立了以创始合伙人、高级合伙人和普通合伙人为分层的合伙人队伍和权力机关。通过股份化改革，确立了3位创始合伙人、12位高级合伙人和14位普通合伙人的三级合伙人队伍。其中创始合伙人认购股权为10股以上，高级合伙人认购股权为2股至10股，普通合伙人可自愿选择是否认购股权，每人不多于2股。通过实际出资，合伙人共同分担律师事务所运营成本，并构建了以创始合伙人和高级合伙人为主体的合伙人会议（律师事务所内的最高权力机关）。

在合伙人会议中，创始合伙人和高级合伙人按照其持股比例行使表决权、收益权等权利，对攸关律师事务所发展方向和战略的事务作出决议；普通合伙人有权列席会议，并行使知情权。

二是形成了以管理委员会为常设机构的决策机关。在创始合伙人和高级合伙人内部，经过全体合伙人投票选举产生7人组成管理委员会，每三年一届，届满后可连任。管委会作为合伙人会议的常设机构，召开定期和临时会议，律师事务所的重大事项在合伙人会议的授权下进行商议并形成决议。管委会召开会议也按照委员所持股份比例进行表决，最大程度上表达了投票人的全部意愿。

三是形成了以部分高级合伙人为监事的权力运行监督机关。在管理委员会之外，设立了类似于公司治理结构中监事的席位，即在高级合伙人中民主选举产生一名监事，每三年一届，届满后可连任。监事有权对律师事务所的管理及运营进行监督；可广泛征集全体律师及其他员工的建设性意见，并向合伙人会议提出议案；同时有权列席参加管理委员会常务会议。

四是设立了以管委会成员为负责人的日常事务执行机关——专门委员会。为有效贯彻和执行合伙人会议和管理委员会常务会议的决议，推动律师事务所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在管理委员会下形成了以管委会成员为负责人的专门委员会，主要包括业务发展指导委员会、律师成长培训委员会、公共关系委员会、战略发展委员会、文化宣传委员会、财务行政委员会等七个专门委员会，分别负责处理律师事务所的业务标准化和提升、青年律师内训及执业技能指导、律所对外关系联络及公关、律所战略远景规划与发展、律所文

化建设与繁荣、律所财务管理及行政事务处理等事务。

五是巩固了以多数高级合伙人为负责人的多个授薪律师团队。在建立律师事务所治理架构的同时，也根据合伙人的特点设立了15个业务部门。一方面，一般情况下每一位创始合伙人或高级合伙人领导一个业务部门，每一业务部门以某一至两类法律业务为主攻方向，部门内部建立授薪制律师梯队；另一方面，独立执业律师在达到一定创收水平和执业年限等条件后有权申请晋升为合伙人，之后根据业务需求有权申请组建或加入具体的业务部门，成为部门负责人。

改革形成制度优势

一是治理结构的设置突显出尊重资本要素和权责统一的行业规律。一方面，对于合伙人的遴选和晋升充分体现出律师业作为智力型和资源型产业的特点，不同级别的合伙人与其创收水平、专业水平、执业经验、资本投入等生产要素等直接契合，也突显出对人才资本和经济资本的高度尊重。另一方面，对于合伙人职权的设置及考核也与其资本投入、群众基础、律师事务所事务管理的参与度和贡献度等密切相关，通过合伙人会议、管理委员会、监事、专门委员会、业务部门等不同职权和功能的设置，充分贯彻权利、义务和责任相对等、相统一的基本法治理念。

通过这样的设置不仅明晰了治理结构，也明确了职权和责任，发挥了合伙人会议、管理委员会、监事、专门委员会等权力机关、决策机关、监督机关和执行机关四位一体的功能，各司其职、相向而行。

二是按持股比例表决能够及时有效作出决议、提高运行效率、避免出现发展僵局。按照持股比例表决的方式是借鉴并融入公司资本多数决、效益与程序并重的理念，是在尊重合伙企业“人合”性后的适度改造；其在改变传统合伙人一人一票模式后，充分考虑不同合伙人对于律师事务所发展的重要程度，强化不同合伙人的责任意识，是律师事务所管理的重大创新。

按照持股比例表决的方式能够保障合伙人会议和管理委员会常务会议作出有效决议，能够提高律师事务所的运行效率，避免因一人一票导致无法作出有效决议，出现律师事务所治理的僵局。

三是一票否决权有助于律师事务所发展的稳定性和长远性，避免简单民主的僭越。在合伙人会议中赋予创始合伙人一票否决权，这既是尊重首创精神和拓荒精神的体现，更是确保律师事务所长治久安、兴旺发达的必要措施。

创始合伙人长期服务于律师事务所，对律师事务所的发展状况可谓“明察秋毫”，对律师事务所的长远发展亦是倾注心血，其个人利益与律师事务所的整体利益及长远利益最能保持高度一致。因此，创始合伙人在极个别的重大事项上行使一票否决权能有效遏制集体决策中的短期化

行为。合伙人按持股比例进行表决时，若出现股权被高度稀释而致趋优决策失灵的状况，一票否决权便能真正发挥力挽狂澜的作用。同时，一票否决权还能有效避免简单民主制对重大正确决策的僭越，奠定了律师事务所稳健发展的基石。

四是专门委员会的设置极大地增强了律师事务所事务管理的广泛参与度和执行力度。每一个专门委员会由管委会成员负责并面向全所招募人员的实践，这不仅有助于增强非合伙人律师对律师事务所的集体认同感和参与感，也增强了律师事务所事务管理的执行力度，同时还分担了高级合伙人的压力，为增加和丰富律师事务所集体活动，以及筹划更多有益于律师事务所整体利益的事务提供了时间和人力上的保障。

五是业务部门与合伙人之间相辅相成的促进关系有助于律师事务所的体系化管理。通过改革，律师事务所内部形成以合伙人为主干，以部门公司化授薪律师人员为主体，以独立执业律师为有益补充的律师人员架构。

没有业务部门及团队支撑的高级合伙人是无本之木，没有高级合伙人领导的业务部门及团队则会成为无源之水。这种业务部门支撑高级合伙人、高级合伙人领导业务部门的模式形成了业务部门与合伙人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这种改革不仅增强了业务部门内部垂直领导的效率和执行力，也强化了不同业务部门之间的互补和协调，有助于律师事务所的体系化管理。

制度是律师事务所的第一生产力，而契合律师事务所自身发展的制度才是好制度。良好的管理制度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人力资本的全部正能量，促进律师事务所健康、持续和快速的发展。

基于律师事务所的发展时期，考量发展机遇、人才储备、业务发展等实际情况，律师事务所进行股份化改造不仅能促进所内日常事务民主决策、广泛参与，而且能确保重大决策稳健、高效地执行。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社会关系日趋复杂，专业化分工日趋细化，法律服务市场客观上要求律师事务所提供更为专业化和体系化的服务，由此，通过股份化改革不断增强律师事务所的核心竞争能力，提高其在法律服务行业的地位，未尝不是建立规模化、专业化、规范化和现代化的律师事务所的可行之路。





【百家争鸣】

律师事务所发展之思考和探索

合伙制律师事务所要快速平稳地发展，除了妥善地建立起管理模式、处理好合伙人关系之外，还需要建立起一系列的具体管理制度与之相配套，形成合伙制律师事务所的管理制度体系。这些具体管理制度主要包括律师事务所的律师管理制度、业务管理制度、行政管理制度等等。

（北京市中伦金通律师事务所张学兵律师《合伙制律师事务所管理制度研究》）

但同时应当看到，规模化也带来了诸如管理效率递减、内部成本加大、文化理念认同不平衡等不可忽视的问题。市场经济环境下，任何组织形式“没有最好，只有最适合”，换言之，“规模化”并不是也不应成为律师事务所发展的唯一路径，况且，目前国内中小规模的律师事务所仍然占主体地位，因此，探讨中小规模律师事务所管理模式创新与专业化发展之路自有其现实意义。

（山东普瑞德律师事务所赵传森律师、李林律师《浅谈中小规模律师事务所的管理模式创新和专业化发展》）

从长远看，专业化能使律所取得长足的发展，但通过何种途径实现专业化，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笔者认为，首先律所要制定符合自身特点的长远发展规划，除此之外，还需要加强自身的业务推广。规模化的大所更需要专业的营销管理体系，让客户了解和认识到自己服务的独到和优越之处，从而固化特有的、稳定的客户群体。从目前法律服务实践来看，专业化程度是律所获得大客户的重要指标。

（北京市司法局吴庆宝《关于律师业的专业化方向》）

在团队化的模式中，合伙人也在悄然改变着律所的管理机构，如：公司制、“大民主”的管理结构、“管理委员会”的管理结构和CEO的管理结构等多种形式，不一而足。尽管这些管理模式各有利弊，或者说能否成功也尚需实践检验，但团队化管理的出现充分说明，走进而立之年的我国律师业，合伙人多了对事业发展的理性思考，并对律师与律所之间就利益分配有了更多权衡。

（北京策略律师事务所主任谢会生《中小律师事务所团队化管理探讨》）

所谓公司化运作主要是指参考现代公司制企业的管理模式，在一套完备的规章制度的规范下，推行科学有序的管理，由律所统一配置人力资源（主要是给律师发工资）和社会资源（主要是各类法律事务的协调分配），内部实行专业化分工，发挥团队协作精神，注重提高核心竞争力的运作模式。

（广东胜伦律师事务所主任肖胜方《什么是公司化运作的律师事务所》）

为了克服公司化、提成制管理模式的缺陷和为律师事务所的管理找到一条有效的管理方法，笔者在此引入一种新的管理模式——类公司化管理模式。类公司化管理模式吸收了纯公司化管理模式中的职能式组织架构和提成制管理模式中的高提成比例这种薪酬制度。笔者认为类公司化管理模式同时具有“资本性”和“人合性”两大特点。

（广州金鹏律师事务所吴秀荣律师《律师事务所类公司化管理模式的引进》）

我认为，可借鉴“一国两制”的智慧，实行“一所两制”，即对律师事务所内部不同业务的律师用不同的模式进行管理。建立这种模式的一个指导方针是，该模式应当将全体相关人员的权益，包括近期利益和长期利益都考虑在内。首先，对于部分团队化、规模化的非诉律师团队，可继续采取相对来说更接近公司制的管理方式，强调工作纪律和业务规范。其次，对于诉讼律师而言，则应考虑到其工作的灵活性，以工作效果为衡量标准制定管理体系，而不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强度上作硬性规定。

（石宇辰《律师事务所管理也可“一所两制”》）

每一个人都是法治城市建设的参与者

——市律协“建设一流法治城市论坛”成果辑录

整理 本刊编辑部

编者按：市政协五届三次会议以来，推进深圳一流法治城市建设被提上重要议程。2012年4月12日，市政协社法委组织到市律协调研，我市律师就“大力支持法律服务业发展、为社会提供优质法律服务”的建议向市政协社法民宗委做专项汇报，相关专业法律意见受到高度评价并被采纳；2013年1月，我市律师广泛参与的《关于把深圳建设成一流法治城市的建议》成为市政协五届四次会议的一号提案；2013年6月8日，我市律师事务所联合相关机构承办“推进一流法治城市建设论坛”；2013年12月27日，我会举办“建设一流法治城市论坛”……在推动一流法治城市建设中，深圳律师不遗余力。

◆2011年10月10日，广东省委常委、深圳市委书记王荣在全市依法治市工作会议上明确地提出要把深圳建设成为“一流法治城市”。在律师眼中，“一流法治城市”有其特别的内涵，律师应在一流法治城市建设中积极作为。

吴淑敏律师（广东海埠律师事务所）：法治城市的内涵应包括城市生活各个领域的法治化，即以法治理念统领城市生活、管理、运行的方方面面。法治城市意味着这个城市应具有完备的法律体系、成熟的法律服务市场、法治的政府、法律至上的城市精神。律师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工作者，是法律职业共同体中的一员，对一流法治城市建设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律师在城市中的社会地位及其对城市政治、经济、文化生活所发挥的社会作用的大小，体现了一个城市和地区法治化的程度。律师在法治城市建设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一是服务民生。基于职业特点，律师与基层群众密切联系，熟悉社情民意。律师通过参与民间调解、信访工作，向人民群众宣传讲解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向有关部门出具法律意见书，有效地化解社会矛盾，引导群众通过合法渠道表达利益诉求，协助有关部门维护社会稳定；二是维护合法权益。通过执业活动、提供法律援助等专业的法律服务，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夯实和谐社会建设的基础；三是参与政治生活。律师通过为政府重大决策进行社会风险评估、担任政府法律顾问、为政府执政提供法律意见、参政议政、参与立法等方式，促进政府依法行政，提高立法质量，推动司法改革，在维护公民合法权益、监督政府执政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杜艳芝律师（广东经天律师事务所）：十八大强调要发展市场经济，如果没有法律保障，便谈不上市场经济。就我理解看，一流法治城市最基本的内涵是一个让市民、企业、政府机构公职人员等都有安全感的城市，公民的人身、财产和企业财产都有法律保障的城市。我就讲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香港沈星香闺被闯，报警一刻就有警员到场拘捕闯入者，最后闯入者被判“签保守行为两年”；美国校园出现求爱者示爱骚扰，只要当事人申请，法庭便可立即下令让其远离。我们国家能做到吗？纵观各地案例和现行法律，目前只有青岛等几个城市在家庭暴力案件中可以适用人身安全保护裁定，我国仅有刑事案件采用了人身禁止令，生活中大量的民事纠纷引发的人身财产安全问题均无禁止令的法律保障，这值得我们深思。深圳在一流法治城市建设的过程中，近应学习香港，远应学习美国，进一步健全法律制度。其中应进一步明确人身禁止令的相关规定，对威胁公民人身安全、财产安全的不法行为予以禁止令保护，使城市发展更有序、更健康、更有活力，人们生活在这个天更蓝、水更绿的环境中有最基本的安全感。

吴波律师（广东宝城律师事务所）：在一流法治城市建设的进程中，律师是直接参与者，更是建设者。律师在提高公民法律意识、促进政府依法行政、增强市场主体依法自律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具体表现为：一是活跃在宣传普法的一线岗位，充分利用司法行政部门搭建的法律宣传平台，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培养公民法治信仰，提升公民法治意识。二是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活动，通过义务法律咨询、法律援助等方式维护弱势群体的合法

权益。三是担任各级政府、职能部门和派出机关的法律顾问,参与政府重大决策,为政府科学决策、民主决策和依法执政提供专业法律意见和有力的法律支持。四是在企业、组织等各市场主体的经营、竞争中,为引导市场主体间通过合法方式解决矛盾纠纷、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起到了定纷止争、稳定社会秩序的重要作用。

◆今后一个时期,深圳将在“三化一平台”上实施重点攻坚,以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和前海开发开放来牵引和带动全局改革。深圳律师可以将前海开发作为着力点和突破口,推动一流法治城市建设。

梁敏律师(广东星辰律师事务所):一流法治城市建设可以将前海开发开放作为突破口。前海区域功能定位和金融产业发展的创新,首先应推进制度创新,建立完备的与国际接轨的法律体系和执法体系,积极推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努力形成安全有序的发展环境,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这个过程中,沿用守旧的理念,照搬现有的司法体制不利于前海发展。因此,个人建议深圳地区可效仿上海自贸区,向国务院提请让相关法律在前海合作区暂停实施,并借鉴发达国家国际经济贸易法律理念和国际惯例,推动开展前海特色的法律体系建设。

◆司法公正公开,历来为公众所关注。深圳在司法公开、司法体制改革方面进行了大胆尝试。2013年底,深圳市网上诉讼服务平台正式上线,直接缩短了当事人、律师办理案件的流程,也在司法公开上迈出了更大步伐。值得期待的是,裁判文书、执行信息等内容也将在该平台上逐步公开。对此,深圳律师进行了深入思考。

汪腾锋律师(广东知明律师事务所):一流法治城市建设具体落实在司法层面,首先应倡导践行司法公开。司法公开才能真正有助于实现有效监督、公正司法,才能极大地避免暗箱操作,这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基础。司法公开方能取信于民,没有司法公开,便谈不上公平公正。然,真正有效的公开才能推进民主法治进步。本人认为,司法公开的具体举措不应仅仅是停留在裁判文书网上公开的层面,更有效更彻底的司法公开应当是确立庭审公开机制。除法定的国家机密与个人隐私不得公开之外,其他一切庭审活动均应允许社会各界人士旁听且文字记录、录音录像资料均应公开。庭审活动实行公开制度,方能真正保障司法公正得以有效落实。

张翔律师(北京市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建设一流法治城市必须进一步深化司法改革。防范司法腐败、

维护司法公正的唯一选择是改革。个人认为,改革的方式之一是大力倡导和推进法官职业化,同时积极防范司法腐败。法官职业化本身包含了建立和强化法官职业道德的内容,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预防司法腐败。推进法官职业化,防范司法腐败要做到:一是应借鉴香港廉政公署制度,巧用外部监督力量,建立起有效的监督机制。二是应完善法官准入制度、遴选制度,允许优秀律师等法律专业人士进入法官队伍。三是完善法官薪酬福利制度,法院财政由地方拨款转变为国家财政统一拨款,确保司法独立。法官职业化走的是法官精英化道路,可以探索建立法官终身制等适合法官职业特点的管理模式和管理制度,确保法官审判中心的地位,赋予其审判资源调配权。

梁敏律师(广东星辰律师事务所):仅靠网上公开生效法律文书并不能彻底有效地解决司法不透明等现实存在的问题。因此,建立健全生效裁判文书评价、讨论机制十分必要,政府责无旁贷。政府在进行生效法院裁判文书网上公开的同时,应不断完善网上公开、网上评价的配套基础设施,建立健全社会评价体系、社会监督体系和错案追究制度,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推动实现司法公开、司法公平。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启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征程。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推动一流法治城市建设走上新的发展阶段,不仅需要律师,也需要全民的积极参与。

程泉律师(广东诚公律师事务所):在一流法治城市建设中,深圳既有优势也有挑战。深圳是一个锐意创新的城市,是改革开放的先行地,没有太多的历史包袱,市场化程度较高,公民法律意识较高等都是深圳的优势。然而,深圳亦没有完全摆脱体制惯性、人情关系等对人们的负面影响。降低负面影响,推进深圳法治化进程,需要更清醒的思考,更完善的制度设计。如何推进一流法治城市建设,个人建议如下:一是做好本职工作。律师首先要立足于做好本职工作推进一流法治城市建设。因为律师执业活动本身是法治建设最基本的一部分,律师执业环境和生存发展状况是体现社会法治水平的重要指标。二是梳理现有法律法规。废除当前不符合国情、影响法治发展的法律



法规；科学立法，率先形成一套更加完善的法律、制度体系。三是涉及社会管理层面的公共事务时，最大限度地尊重、保护和实现民众的知情权、建议权、监督权，并建立操作性强的纠责机制。四是“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善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防范腐败。五是“一流法治社会的建设，不是空洞口号堆砌而出，它需要所有有识之士的共同努力。我是一名普通律师，我愿意以普通法律从业人员的身份为一流法治城市建设竭尽全力。

何志军律师（广东深宝律师事务所）：推动深圳实现一流法治城市的目标，我认为：一、必须推动司法制度改革在深圳率先取得重大突破，推动实现法官和检察官职业化、律师民事诉讼代理和刑事辩护常态化，严格限制民事诉讼公民代理，规定公诉人出庭的刑事案件必须有律师出庭辩护；二、推动政府购买法律服务，逐步将政府经济、社会建设中的法律事务移交专业法律服务机构提供服务和进行管理；三、率先在深停止适用卖淫嫖娼收容教育的行政处罚制度；四、推动司法公开、政府信息公开，确保社会监督力量有效监督；五、全面开放公共信息资源的查询权限；六、通过公示诚信状况、限制投资消费、严格惩处措施等方式，加快公民、企业、社会组织诚信机制的建设和完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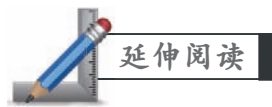
张翔律师（北京市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一流法治城市建设应注意：一是推进民主立法。民主法治建设是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深圳要高度重视法治建设，加大立法、执法、司法、普法等方面投入。首先，加强立法，提高立法质量；其次，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学法用法，带头树立法律权威；最后，推进科学立法的过程中，要避免部门立法、少数人立法，加大公众参与度，承认和尊重律师等法律专业人士的作用，推进立法民主。二是进一步完善社会管理制度。转变管理思路，创新社会管理方式，变二元的管理结构为政府对社区和行业组织、社区和行业组织对社区内和行业内的公民和企业管理的三元管理结构。三是借鉴国际成熟经验，建立公职人员财产登记、申报、公告制度，将权力置于阳光之下，进一步完善法律监督机制，加大反腐力度，构造一个公平、公正、公开的社会环境。

虞明生律师（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一流法治城市建设中，各职能部门、各行业人士首先要做到各司其职。立法机关要加强立法工作，科学立法；司法机关应依法办案、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执法机关应规范行政执法行为，严格依法行政；广大人民群众则应将行为纳入法律范畴，依法办事，善用法律手段解决问题。我们律师群体则应努力做到如下几点：一是坚定法律信仰，树立职业荣誉感和尊严感；二是善用互联网、微博等方式宣扬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彰显律师执业精神；三是坚持依法执业，以事实为

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四是执业活动之外的生活中遵守法律，依法行事，不得与国家法律法规相违背。法治建设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一流法治城市建设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如果每一个人都能投入到一流法治城市建设，各司其职做好本职工作，相信一流法治城市的目标将很快能实现。

董会莲律师（广东晟典律师事务所）：将深圳建设为一流法治城市这个目标自上而下发起，单靠某一群人或某一个组织机构难以实现。一流法治城市建设是一个系统庞大的工程，需要政府下定决心大力推动，也需要全体市民积极参与。在一流法治城市建设中，市民应知法、守法、依法办事，政府则应依法执政、依法治市，我们律师作为法律职业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则应充分发挥法律专业特长和职业优势，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推动一流法治城市建设。我相信，我们每一位律师都愿意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工作者的职责和使命，成为一流法治城市建设的积极参与者。

每一个人都是一流法治城市的受益者、参与者。随着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加入到一流法治城市建设的队伍，我们相信，光明的未来必不太远。



深圳市委、市政府2013年12月3日印发《深圳市加快建设一流法治城市工作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决定分阶段、分专题推进一流法治城市建设，力争到2015年底取得阶段性成效。该《方案》按照先易后难、分步推进、注重实效的原则和制度化、常态化的要求，将分为三个阶段推进法治城市建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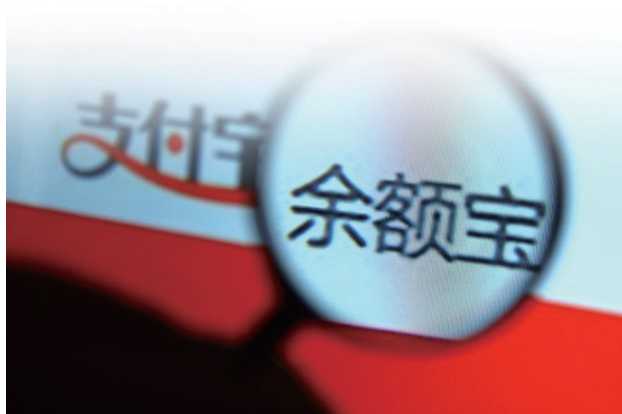
第一阶段从2013年12月到2014年6月，集中开展深入推进党政机关及领导干部学法遵法守法用法、全面推进法规实施、涉法涉诉信访工作改革、司法体制机制改革、前海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建设提速、重点领域行政执法监督检查、市民法治素养大提升等七项专项行动，重点解决当前法律实施过程中比较突出而紧迫的问题。

第二阶段从2014年7月到12月，计划开展扩大公众有序参与立法、政府规章和规范性文件清理、政府信息透明度提升、依法行政报告、行政执法和服务水平提升、司法公开等六项专项行动。

第三阶段从2015年1月起至年底，计划开展党委政府决策合法性审查、加强人大法律监督、严格执行行政问责制度、加大法治政府考核力度、创新审判权力运行机制、强化诉讼监督等六项专项行动。（来源：新浪网）

从“全额宝”遭遇“余额宝” 看商标的独创性

文 广东都源律师事务所 王小敏律师



2013年6月，阿里旗下的支付宝成功推出“余额宝”，业界掀起了一股互联网金融热潮，众多互联网巨头先后扎进互联网金融领域的新蓝海。著名投资人史玉柱旗下的巨人网络也开始试水互联网金融，并于七月向国家商标局提交“全额宝”商标注册申请，同时还注册了相关域名及官方微博，由此引发业界广泛猜测。

笔者在此不去探究巨人网络试水互联网金融的虚实，仅对其申请注册“全额宝”商标一事发表法律相关的看法。

知识产权风险

商标注册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因需要国家商标局审查核准，故任何商标的注册都会面临被商标局驳回的风险，只是风险的大小程度不同而已，同时，也存在被业界竞争对手甚至非竞争对手提出异议的风险。

巨人网络的“全额宝”商标虽经国家商标局受理，但是其最终能否顺利通过注册，目前还是未知数，其注册过程恐会面临较大风险。

首先，可能面临被驳回的风险。我们都知道，支付宝的“余额宝”推出时间比巨人网络的“全额宝”要早，暂且不说两者的产品领域（商品或服务类别）是否一致或类似，单纯从商标名称本身来看，“全额宝”与“余额宝”

会有多大差异？该差异能否足以使一般消费者不产生混淆和误认？无论是商标文字的构成形式还是整体的视觉形象，两者都区别甚微，唯一不同的仅有商标首字，“余”与“全”虽然读音不同，但是字形近似。两者商标整体区别不明显，易使相关公众对商品或服务的来源产生误认。

再看商标的类别，虽然国家商标局的数据库目前还检索不到“余额宝”和“全额宝”商标的注册记录，但是根据支付宝和巨人网络两家公司的互联网特性，其产品必然会涉及到第42类的计算机程序，因此，两者的产品商标必然也会涉及该类别，极有可能构成服务类别相同或类似。至于“全额宝”会否涉及第36类的金融服务，目前还属于巨人网络的商业秘密，但是如果“全额宝”涉及网络游戏的消费与支付，必然会使用“电子转账”功能，该功能项目也属于第36类似群，与“余额宝”依然可能构成服务类别相同或类似。

最后，不排除会被支付宝等业界同行提出商标异议。即使“全额宝”商标没被商标局判定为近似而被驳回，也有可能被支付宝等同行提出商标异议，申请撤销其初步审定公告，致使“全额宝”最终无法获得注册。毕竟，如果市场上同时存在“全额宝”与“余额宝”，对支付宝和阿里集团来说，可能不是一件好事，对消费者来说，恐怕也会带来困惑。

全额宝的考量

既然，“全额宝”与“余额宝”存在近似，为什么巨人网络还要申请注册该商标呢？可能出于以下几种考量。

其一，借势。目前阿里的“余额宝”风头正劲，引发了业界的密切关注，在此时推出“全额宝”，必然会引起业界和网民的广泛关注，“全额宝”随之与“余额宝”风头并进，名气大增，网络营销效果立竿见影。

其二，捷径。“全额宝”本身通俗易懂，便于推广，非常符合现今互联网流行的略带“屌丝”气质的命名方式，贴近网民而又不失其标识性。对巨人网络来说，曾经

还特意注册过“屌丝”商标，非常擅长抓住公众的眼球，以此推广其产品或服务，不失为一种捷径。

其三，资本。互联网是资金密集型产业，不管是扩大规模，还是开拓新产业链，都需要外部资金的注入，而风险投资机构向来又偏爱互联网行业。巨人网络通过透露其已申请注册“全额宝”商标及其域名之举，可向外界暗示其积极抢占互联网金融新蓝海业务的市场先机，从而进行公司战略转型，走多元化经营的发展之路，以吸引风险投资或战略投资。

巨人网络申请注册“全额宝”商标，除了上述缘由之外，从深层次角度来看，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现今业界对品牌塑造的“懈怠”，导致品牌命名越来越缺乏新意，跟随之风盛行，市场上出现众多类似风格的系列商标，商标之间的显著识别特性越来越模糊，显露出商标独创性的迷失和申请人急功近利的心态。

比如，阿里“余额宝”的成功给相关行业带来巨大信心，纷纷推出类似产品，就连产品的命名也都要带上“宝”。如众禄基金推出“现金宝”，天天基金网也在2013年7月推出“活期宝”，现在，巨人网络又推出与“余额宝”仅一字之差的“全额宝”。各“宝”之间的“界限”实在让公众难以辨别，显著性本身就不强，更别说独创性了。

商标的根本目的在于区分商品或服务的来源，即区别商品或服务的提供者。商标的独创性越强，其显著性就越强，也就越具有可识别功能。独创性强的商标通常都是臆造词，无实际的含义。国外的比如索尼、柯达，国内的比如海尔、比亚迪等，都是独创性极强的商标，具有极强的可识别性。而商标如果采用叙述性词汇，则显著性一般都不强，虽然可靠后天的广泛宣传和使用增强其显著性，但其成本是极其高昂的，而且容易被淡化。

独创还是模仿

独创性作为商标显著性的根基，是商标之所以称之为“商标”的核心要义，任何一家相信品牌力量的企业都应该重视其品牌或商标的独创性。但实践中，虽然很多企业知道并相信品牌的威力，但往往又急于去创造品牌，而乐于模仿或跟随现有的在先品牌，原因何在呢？

一方面，创造品牌并非简单的事，特别是创造一个全新的具有独特创意的品牌时，前期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思索、策划、查阅资料等，后期还需要花费高昂成本去宣传推广、塑造品牌知名度。另一方面，在商业竞争瞬息万变的快速消费时代，企业追求更快、更多利润，沉下心来用数年时间经营一个品牌显然对其“不经济”、

► 商标的根本目的在于区分商品或服务的来源，即区别商品或服务的提供者。商标的独创性越强，其显著性就越强，也就越具有可识别功能。独创性强的商标通常都是臆造词，无实际的含义。国外的比如索尼、柯达，国内的比如海尔、比亚迪等，都是独创性极强的商标，具有极强的可识别性。而商标如果采用叙述性词汇，则显著性一般都不强，虽然可靠后天的广泛宣传和使用增强显著性，但其成本是极其高昂的，也容易被淡化。

“不划算”，但直接使用他人的品牌却又触犯法律规定。

“两权相害取其轻”，此时，通过模仿或跟随战略，采用与他人先在品牌相同或相似的名称或风格，走品牌“捷径”就成为某些申请人“可行”的选择。

有观点认为，独创一件文字商标，特别是易识别的臆造商标，是极其困难的，因为常用汉字数量有限，极大地限制了中文商标的创造空间。

该观点笔者不敢苟同，因为其本质是在为急于独创商标或品牌找借口。据统计，1990年徐仲舒主编的《汉语大字典》，收录汉字数为54678个，1994年冷玉龙等的《中华字海》，收录汉字数更是惊人，多达85568个，近来根据北京国安资讯设备有限公司公布的汉字库，共收录有出处的汉字更是达到91251个，而公认的常用汉字也有5000个左右。如此数量的汉字，何以会限制中文商标的创造？

英文字母只有26个，却能创造出数十万的英语单词。常用汉字数千个，能够创造的文字商标会有多少呢？即使按照单个汉字、两个汉字、三个汉字、四个汉字等中文商标常用的构成形式进行组合创设，数量也是惊人的。更何况，商标创设并非一定要使用中文，采用英文商标作为企业的品牌，也依然能够被识别，比如TCL、HTC、OPPO等国内知名企业，都采用的是英文商标。

因此，真正限制商标独创性的不是汉字的数量，而是创造性思维的局限。

启示

移动互联网时代，信息传播的速度和深度都在加速递增，方式多种多样，饥饿营销、口碑营销、粉丝营销、微博营销、微信营销等营销概念和口号层出不穷，也造就了一批迅速崛起的国产品牌，比如小米、京东、凡客、天猫、优酷、微信等等，不胜枚举。

显然，移动互联网的为品牌迅速成长提供了可能，可以说这是一个品牌营销的“黄金时代”，成本低、收效快、受众广。不管是传统企业，还是互联网企业，抑或是移动互联网企业，都不必在商标或品牌命名上采取模仿或跟随战略，其完全可以利用新思路，打造新品牌，开拓市场新蓝海，找回商标应有的独创性。

中港婚姻及家事法探析

文 香港杜伟强律师事务所 杜伟强律师

随着1997年香港回归，中港两地不论在经济还是文化上，彼此的联系日渐紧密，两地人民的接触不断增加，中港跨境婚姻日趋普遍。根据香港政府统计处及司法机构年报，从1997年到2012年期间，在香港注册结婚的人士中，一方为内地人士的数量逐年递增，并由1997年占香港注册结婚总数的7%增至2012年的35.2%。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中港两地人们对婚姻的看法也在发生改变。近年来，离婚数量日益增涨，已从2001年约13000宗增涨至2012年的21000多宗。其中涉及内地人士的离婚约占总数的30%。这种趋势无疑对香港社会带来重要的影响。此外，香港采用诉讼离婚制，这种趋势同时亦使香港家事法庭面临新的挑战，司法管辖权争议、平行诉讼以及挑选法院等情况越发常见。

本文将结合笔者所在律师事务所办理的案件，阐释香港家事法及香港离婚程序，深入探讨司法管辖权争议及平行诉讼等问题。

香港离婚诉讼概要

香港采用诉讼离婚的法律制度，即婚姻当事人必须通过法院批出离婚判令，方可解除婚约。

根据香港法例第179章《婚姻诉讼条例》第3条，不论婚姻是否在香港注册，如属以下其中一项情况，香港家事法庭具有司法管辖权，婚姻任何一方，可以在香港家事法庭呈请离婚：（1）在呈请或申请提出当日，婚姻的任何一方以香港为居籍；（2）在紧接呈请或申请提出当日之前的整段3年期间内，婚姻的任何一方惯常居于香港；或（3）在呈请或申请提出当日，婚姻的任何一方与香港有密切联系。

但是即便香港家事法庭有司法管辖权并处理该离婚呈请，呈请人亦需证明“婚姻已破裂至无可挽救”，法庭方会批发离婚判令。根据香港法例第179章《婚姻诉讼条例》第11A条，要证明“婚姻已破裂至无可挽救”，呈请人可以基于以下一项或多于一项的事实作为

依据：（1）答辩人曾与人通奸，而呈请人认为无法忍受与答辩人共同生活；（2）因答辩人的行为而无法合理期望呈请人与其共同生活；（3）婚姻双方在紧接呈请提出前，已分开居住最少连续一年，且答辩人同意由法院批出判令；（4）婚姻双方在紧接呈请提出前，已分开居住最少连续2年；（5）答辩人在紧接呈请提出前，已遗弃呈请人最少连续1年。

离婚呈请启动后，香港家事法庭需要处理的事宜有三项：分别为（1）解除婚姻的离婚主体诉讼；（2）子女安排（如有）；及（3）附属济助。

解除婚姻分为两个阶段：如果法庭认为离婚依据及理由充分，就会批出“暂准离婚判令”。颁发“暂准离婚判令”至少六星期后，以及在法庭满意子女及附属济助的安排后，法庭会根据第192章《婚姻法律程序与财产条例》第18条发出“绝对离婚判令”，正式解除婚姻。换言之，如子女安排及附属济助的争议尚未解决，法庭不会发出“绝对离婚判令”。

子女的安排可分为三种：（1）管养权；（2）照顾及管束；（3）合理探视权。法庭会以子女的利益为依归，决定管养权、照顾及管束权归属。如一方获判管养权、照顾及管束权（即“单独管养命令”），另一方享有合理探视权。近年，法庭鼓励双方共同管养（即“共同管养命令”），希望藉此让离婚父母共同参与子女成长的重要决定，从而降低父母离异对子女，尤其是对年幼子女的伤害。

附属济助就是处理配偶及子女的经济给养（即赡养费），以及家庭资产分配的问题。法庭评定配偶及子女赡养费时，会考虑诸多的因素，包括家庭在婚姻期间的生活水平及双方各自的经济状况等。一般而言，配偶赡养费由“绝对离婚判令”批出后开始支付直到受养一方死亡或再婚，以较先为准。至于子女赡养费的责任则由“绝对离婚判令”批出后直到其18岁或完成高等教育，以较后为准。

如家庭资产庞大，资产分配争议往往最为激烈。根

据香港现行案例，一般而言，夫妻分配资产的原则以平分为起点，法庭再会考虑案情事实背景及其他考虑因素后，作出公平的分配。

香港家事法庭的司法管辖权

中港跨境离婚诉讼的特色是案件尚未进入实体离婚诉讼前，婚姻当事人往往提出司法管辖权争议。如上文所述，只要符合香港法例第179章《婚姻诉讼条例》第3条中任一项规定，香港法院具有司法管辖权。

其中，“居籍”是普通法的一个法律概念，是一个人与一个地方的关系，有别于国籍或居留权。根据香港法例第596章《居籍条例》第3条，每名个人均有居籍。《居籍条例》第5条说明居籍共分为两种：任何个人于成为成年人时，保留在紧接成为成年人之前的居籍，称为“原生居籍”，此概念与内地的“户籍”相似；而成年人如身处某国家或地区，而且意图无限期以该国家或地区为家，则取得该国家或地区居籍为新居籍，称为“选择居籍”。

除了居籍外，另外一个确立司法管辖权的条件是，婚姻的一方于呈请或申请提出当日之前的3年内惯常居于香港。一般的情况下，“惯常”的重要性体现于以下两点：(1)自愿选择居住；及(2)以定居为目的。法例并没有对“惯常居住”定下确实的准则，但法庭会考虑整体案件的背景，包括居留日数及素质，而决定婚姻的一方是否惯常居于香港。

同样地，在考虑第三个条件，即是在呈请或申请提出当日，婚姻的任何一方是否“与香港有密切的联系”时，法庭会视乎每个案件的案情，例如在香港居住的年期、居住的物业、生意及投资、工作等，以决定婚姻的一方与香港是否存有关联，以及关联的程度是否密切。

【Y v W 案】案例 Y v W(2011)，香港家事法庭就婚姻当事人是否居籍于香港作出判决，从而判定香港家事法庭是否具有司法管辖权。



此案婚姻双方皆于内地出生及成长，青梅竹马。女子于1995年取得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证，于1997年在美国大学毕业后并到香港工作，于2001年在香港成立了一间有限公司，从事公关业务。后来女子与男子在北京重遇，并于2002年与男子在北京同居。2003年，女子怀孕并到香港诞下儿子，双方于同年年底在香港注册结婚。婚后，双方继续在北京生活，2008年双方开始分居。2010年年底，丈夫先在北京朝阳区法院提出离婚诉讼，而妻子亦在2011年年初在香港家事法庭提出离婚诉讼。丈夫随后在香港提出司法管辖权争议，而妻子也同样地在北京法院提出司法管辖权异议，并迅速于两个月内获得胜诉，北京法院不具司法管辖权，该离婚诉讼应由香港法庭处理。丈夫提出上诉，后被驳回。

在香港的司法管辖权争议中，丈夫提出的理据为：双方的居籍在内地，双方均惯常居住在内地；双方与香港没有密切联系。故此，香港法院不具司法管辖权处理该离婚诉讼。

此案无需争议的是，双方的原生居籍均在内地。法庭要考虑的是：妻子是否因为她于1997年返回香港工作以及于2001年在香港成立了一家公司而取得“选择居籍”？再者，即使妻子在香港获得新的“选择居籍”，她于2002年随丈夫返回内地长住是否属于放弃香港的选择居籍，并恢复其原生居籍于内地？

最后法庭裁定：双方原生居籍在内地，婚姻居所在北京，家庭及子女都在北京生活及成长，双方在香港没有资产。虽然妻子于1995年取得了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证，但纯粹拥有身份证不能证明妻子的选择居籍在香港。即使妻子于2001年在香港成立了一间公司，但该公司大部分活动皆发生在内地，而且2002年至2004年间她逗留在香港的时间总计少于1/3，期间只是借住朋友家或酒店，并不构成无限期地以香港为家的意图。再者，就算妻子于1997年返回香港工作而取得了选择居籍，但亦因2002年随丈夫返回北京长住而恢复其内地的居籍。基于以上理由，香港法庭裁定丈夫胜诉，认定香港法庭没有司法管辖权处理该离婚诉讼而撤销香港离婚诉讼。

Y v W(2011)一案，法官特别指出，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证不能直接证明该名人士的“居籍”在香港，而在考虑是否具有司法管辖权时，北京法院的判决不影响香港法庭的决定。

中港离婚平行诉讼及不方便法院原则

除了司法管辖权争议外，两地发生平行诉讼也是跨境离婚诉讼的一大特点。当香港及内地法院均对该段婚姻具有司法管辖权时，婚姻当事人分别挑选对自己有利

的法院作离婚申请，引致形成“平行诉讼”，其后果可能是两地法院作出不同，甚至有矛盾的判决，此情形不但造成两地法院的尴尬局面，更甚者是会造成执行上的困难。

发生平行诉讼时，婚姻当事人可以用“不方便法院原则”向香港法庭申请搁置香港离婚呈请。香港法庭需通过三个阶段考虑不方便法院原则。第一阶段是，表面上是否明确地另有更合适的法院审理该离婚诉讼。如是，法庭会进入第二阶段，即考虑该离婚案件由另一法院审理是否对申请人有个人或司法上的利益。进入第三阶段时，法庭则会评估搁置香港诉讼是否公平及对双方有利。

【LS v AD案】 LS v AD(2012)一案，正是展现了香港法庭如何经过以上三个阶段的考虑，最后裁定当事人不能通过不方便法院原则，而继续处理香港离婚呈请的好例子。

婚姻双方皆于内地出生，皆拥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双方于2001年在北京正式注册结婚。丈夫为香港某上市公司主席及大股东，婚后因工作关系主要居住在香港，只在节日及假期时返回北京与妻子及家人团聚。双方育有一子一女，皆于香港出生。子女出生后均随妻子回北京生活和就学，并一直由妻子独力照顾。

2012年1月，妻子于香港法庭提出离婚呈请，一星期后丈夫在北京市朝阳区法院亦提出离婚诉讼。妻子随后在北京法院提出司法管辖权争议，而丈夫也在香港法庭以不方便法院原则要求搁置香港离婚呈请。3个月后，北京法院判决妻子的司法管辖权争议胜诉，驳回北京离婚诉讼请求。丈夫提出上诉，并于同年8月上诉成功，离婚诉讼被发还北京法院继续审理。

同年9月，香港法院就丈夫提出的搁置申请进行聆讯。经双方质证，考虑双方提交的证据及意见，香港法庭认为，妻子与两名子女长期居于北京，妻子在北京拥有多个物业，而且丈夫与北京关系密切，双方与北京的关系不容置疑。并且北京上诉法院已批准丈夫继续于内地进行离婚诉讼，所以表面上，的确是另有合适的法院审理该离婚诉讼。法院第一阶段的考虑通过。

至于在内地法院审理该离婚诉讼是否对丈夫有个人或司法上的利益，香港法庭考虑到妻子在香港的离婚呈请是基于丈夫的不合理行为。就此，丈夫表明必会强烈抗辩，并且将会传召大批证人到香港作证。相反，如该离婚诉讼由北京法院审理，北京法院无需就丈夫的不合理行为进行审理，离婚诉讼相对简单，因此法庭同意从司法利益的角度上，北京法院对丈夫有个人及司法上的利益。法院第二阶段的考虑通过。

进入第三阶段，香港法庭需要评估，如果搁置香港诉讼是否公平及对双方有利。考虑到该案件所涉及的资产庞大，法庭最大的争议无疑在于财产分配。香港的司法程序可提供完整及详尽的文件披露机制，如果该离婚诉讼由内地法院审理，法官认为妻子在资产的争议上将会面临极大的困难，对妻子不利。基于此点，香港法庭认为第三阶段未能通过，最后判决妻子胜诉，驳回丈夫提出的搁置离婚诉讼申请，即香港法庭将继续处理该离婚诉讼。

两地法院的判决形成平行诉讼的局面。前路茫茫之际，诉讼双方其后就子女管养权及财产分配达成共识，并选择在北京解除婚约，避免了平行诉讼可能导致两地法院作出不同判决时的情况。

香港婚姻法律的最新发展

香港司法程序提供完整及详尽的文件披露机制，对争取附属济助方面尤其有利，以致跨港婚姻当事人都希望选择由香港法庭处理财产分配的问题。在推行新法例香港法例第192章《婚姻法律程序与财产条例》第29AB条至第29AF条以前，附属济助必须“附属”于离婚主体诉讼。换言之，离婚必须由香港法庭处理，婚姻当事人方可同时要求香港法庭处理附属济助的申请，因而引发一连串涉及跨港婚姻的司法管辖权争议及平行诉讼问题。

2011年3月1日，第192章《婚姻法律程序与财产条例》第29AB条至第29AF条正式生效。根据第29AB条，如一段婚姻因香港以外地方的司法程序或其他法律程序而遭解除或废止，或婚姻双方因香港以外的司法程序或其他法律程序而合法分居，即该项离婚、废止或合法分居获香港法律承认为有效，婚姻的其中一方可按照法院规则，向法庭申请经济济助命令。当然，申请人亦需要通过第29AE条所订下的司法管辖权条件，并取得香港法庭的许可，方可向香港法庭申请经济济助。新法律的目的是缓解跨港婚姻当事人争相到香港法院提出离婚程序的斗争。

结论

因为两地司法制度的不同，跨港婚姻当事人在香港呈请离婚需要经过不同的挑战及考验，包括司法管辖权争议及平行诉讼带来的风险。随着中港婚姻及离婚数量日渐增加，中港离婚的平行诉讼相对增多，并产生了裁决不一致及执行判决方面的问题。香港法例第192章的新法例扩大了香港法庭的权力，以处理在香港以外离婚后之经济济助。但是新法例是否有效地解决当前的问题，仍是未知之数。



代持股股权转让若干所得税问题

文 北京市康达（深圳）律师事务所 吕志合律师

相关法律问题

代持股，是一个典型的隐名投资行为，即实际出资人由于某些原因不以自己名义持有股份而以其他人或组织的名义作为股东办理工商登记、履行股东权利义务的一种股权处置方式。在代持股行为中，存在代持股者和被代持股者，代持股者是“显名股东”，即名义股东。被代持股者是“隐名股东”，即实际股东。代持股项下的股份是实际股东的一项资产，代持股的股份处置时间、价格等事项均由实际股东确定，投资的风险和收益完全由实际股东承担。名义股东和实际股东之间是一种委托关系，名义股东因代持股产生的权利或义务均来自实际股东的授权。在投资市场中，代持股的情形并不鲜见。对于代持股的法律效力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对此持肯定的态度。在实务操作中，实际股东和名义股东通常签订代持股协议约定双方的主要权利和义务。根据代持股所涉及的主体，代持股主要可以分为企业间的代持股，个人之间的代持股，企业和个人之间的代持股。

现行税收法律规范对于代持股涉及的税务问题，仅有国家税务总局颁布的《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转让上市企业限售股有关所得税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2011年第39号公告，以下简称39号公告）对转让股权分置改革过程中引起的企业为个人代持限售股份的有关所得税问题进行了规定。对其他类型的代持股涉及的所得税税务问题则没有规定。39号公告之外的代持股股权转让是否产生所得税纳税义务，纳税主体的确定，纳税义务发生时间等有关税务问题需要税收法律规范予以明确。

代持股股权转让是否产生纳税义务

代持股股权转让的受让主体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代持股的实际股东，一类是实际股东以外的主体。代持股转让于实际股东之外的主体实际上产生股权转让所

得，因此，此类代持股股权转让行为产生纳税义务，在此不予赘述。以下对代持股股权转让于实际股东是否产生纳税义务进行探讨。

实际股东若因各种原因需要名义股东代持股，待条件成熟后又希望将股份登记在自己的名下，则会产生代持股股权转让于实际股东的情形。名义股东变更为实际股东的“股权转让”是否要纳税？名义股东变更为实际股东的股份变更登记仅为形式变更，实际上并不产生股权转让所得。根据实质重于形式的税法基本理论，名义股东变更为实际股东的“股权转让”无需缴纳企业所得税或个人所得税。39号公告“企业将其代持的个人限售股直接变更到实际所有人名下的，不视同转让限售股。”39号公告此条规定是对实质重于形式的运用。由于现行税收法律规范对名义股东变更为实际股东的“股权转让”是否无需纳税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名义股东变更为实际股东的“股权转让”可能面临被税务机关要求纳税主体按照公允价值计算缴纳所得税税务风险。

为最大限度降低名义股东变更为实际股东的“股权转让”的税务风险，实际股东与名义股东在进行代持股行为时要增强证据意识。一方面要签订全面、细致的代持股协议并及时办理公证鉴证手续，另一方面要注意搜集保存好证明股权关系的证据，包括但不限于代持股协议、出资的支付凭证、股东会决议、参与公司利润分配的凭证。此外，实际股东或名义股东应加强与税务机关的交流和沟通，必要时可通过确权诉讼确认代持股的法律关系。

此外，个人之间的代持股可以通过审慎选择代持股者的方式最大限度地降低名义股东变更为实际股东的“股权转让”的税务风险。《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股权转让所得个人所得税计税依据核定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0年第27号公告）的规定，“将股份转让给配偶、父母、子女、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兄弟姐妹以及对转让人承担直接抚养或者赡

养义务的抚养人或者赡养人，如果申报的股份转让价格偏低，则被视为有正当理由而免于核定征收。”根据《广东省地方税务局关于加强股份转让所得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的通知》（粤地税函[2009]940号）第五条第一款的规定，“（一）个人将股份赠与供养关系、赡养（抚养）关系、继承关系人的，赠与方与受赠方均不征收个人所得税。供养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兄弟姐妹。”因此，实际股东若因各种原因需要名义股东代持股，待条件成熟后又希望将股权登记在自己的名下的，应尽量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选择配偶或直系亲属作为代持股者以避免可能产生的税务风险。

代持股股权转让的纳税主体

在代持股中，存在实际股东与名义股东的实质和形式之差异，由此产生的问题是，若代持股股权转让需要交纳所得税，则纳税主体是名义股东还是实际股东？

有观点认为，代持股股权转让的纳税主体是实际股东，其理论基础是实质重于形式原则。我国《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对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做了规定，即“企业应当按照交易或者事项的经济实质进行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不应仅以交易或者事项的法律形式为依据。”我国税收法律规范中并没有“实质重于形式”的明确条文，但在税收实践中，实质重于形式在某些情况下是被采纳的。若采实质重于形式原则，纳税主体为实际股东，名义股东在收到实际股东应享有股份转让款时，名义股东无需缴纳所得税。

有观点认为，代持股股权转让的纳税主体是名义股东，其理论基础是形式重于实质原则。形式重于实质原则便于税务机关的税收征管。在形式重于实质原则下，名义股东出售代持股取得的收入全额确认为投资

转让收入，并扣除历史投资成本后对投资转让净收益征收所得税。

目前，我国股权转让分置改革过程中引起的企业为个人代持限售股份的纳税主体是名义股东。39号公告规定，因股权分置改革造成原由个人出资而由企业代持有的限售股，企业在转让限售股时，由企业（名义股东）按规定缴纳企业所得税。由于专门针对代持股所涉及的股权转让问题的税法法规的缺位，理论界和实务界对39号公告规定的之外代持股股权转让的纳税主体是实际股东还是名义股东存在分歧和争论。这将对税收实践带来困扰，一方面不利于税务局对代持股股权转让税收征管，另一方面也对代持股当事人纳税义务产生不确定性。

因此，笔者认为，现实中需要相关的规范性文件对39号公告规定的之外代持股股权转让的纳税主体是实际股东还是名义股东进行明确。若将纳税主体界定为实际股东，符合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但可能给税务机关的税收征管带来难题。例如，税务机关对工商登记之外实际股东税收征管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若将纳税主体规定为名义股东，不符合实质重于形式原则，但可能更便于税务机关的税收征管。因此，为了便于税收征管而将名义股东规定为纳税主体，不失为一种选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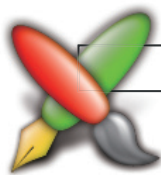
代持股股权转让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

代持股股权转让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的确定因股东身份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纳税主体的身份为企业股东的，其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转让协议生效，且完成股权变更手续时。《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贯彻落实企业所得税法若干税收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10〕79号）规定：“企业转让股权收入，应于转让协议生效，且完成股权变更手续时，确认收入的实现。”即企业股权转让所得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以股权变更登记为准。

纳税主体的身份为个人股东的，其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并完成股权转让交易时。《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股权转让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管理的通知》（国税函〔2009〕285号）规定：“股权交易各方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并完成股权转让交易以后至企业变更股权登记之前，负有纳税义务或代扣代缴义务的转让方或受让方，应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纳税（扣缴）申报，并持税务机关开具的股权转让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完税凭证或免税、不征税证明，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即个人股东股权转让纳税义务时间以在股权转让协议生效后股权变更登记前为准。





浅析家用汽车“三包”规定

文 北京市炜衡（深圳）律师事务所 陈伟律师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家用车辆已经渐渐成为人们不可缺少的交通工具。国家立法总是滞后于社会矛盾，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1994年1月1日实施）没有明确规定将家用汽车纳入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范畴，家用汽车消费维权领域长期存在只修不退、不予更换、多次修理仍不能解决问题、销售者借故推脱责任等问题，部分地方甚至出现车主挥泪砸车等无奈之举。消费者在该领域的维权可谓“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笔者认为，家用汽车的消费维权问题层出不穷，皆因相关法律法规缺失。

2012年6月27日，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局务会议审议通过《家用汽车产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以下简称家用汽车“三包”规定），该规定将于2013年10月1日起施行。该规定明确了包修期、“三包”期及销售者应当承担的“三包”责任，并从行政处罚层面规定了销售者不履行“三包”责任应承担的法律责任。该部法规的正式出台将改变家用汽车消费维权领域长期存在的问题，标志着家用汽车维权的春天来临。

家用汽车“三包”规定的主要内容

本文将通过分析家用汽车“三包”规定的主要内容，与读者分享家用汽车维权的经验和注意事项，以便同仁运用该法规积极为消费者维权。

适用范围。该法规适用于家用汽车产品，即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而购买和使用的乘用车。如果将购买的汽车用于出租、汽车营运、生产经营活动等用途的，根据家用汽车“三包”规定第三十条的规定，在家用汽车产品包修期和“三包”有效期内，经营者对于所涉及到的产品质量问题，可以不承担该法规所规定的“三包”责任。

内容。“三包”内容是指汽车产品生产者、销售者和修理者在质量保证期内，因汽车产品质量问题，对汽车产品修理、更换、退货的行为。其中，质量保证期包括包修期、“三包”有效期易损耗零部件的质量保证期。

责任主体。家用汽车“三包”规定明确规定“三包”责任承担主体是销售者。该法规第4条规定：“本规定所称‘三包’责任由销售者依法承担。销售者依照规定承担‘三包’责任后，属于生产者的责任或者属于其他经营者的责任的，销售者有权向生产者、其他经营者追偿。”同时，家用汽车产品经营者之间可以订立合同约定“三包”责任的承担，但不得侵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不得免除依法应承担的“三包”责任和质量义务。

根据民法通则、侵权责任法、产品质量法的规定，如因产品质量产生争议的，消费者可以选择向生产者或者销售者主张权利。生产者或经营者在承担赔偿责任以后，可以依法向经营者或者生产者进行追偿。如产品质量法第四十三条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人身、他人财产损害的，受害人可以向产品的生产者要求赔偿，也可以向产品的销售者要求赔偿。属于产品的生产者的责任，产品的销售者赔偿的，产品的销售者有权向产品的生产者追偿。属于产品的销售者的责任，产品的生产者赔偿的，产品的生产者有权向产品的销售者追偿。”《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三条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向产品的生产者请求赔偿，也可以向产品的销售者请求赔偿。”

家用汽车“三包”规定没有将生产者纳入家用汽车“三包”的责任主体范畴，其主要目的是在发生诉争时，防止和避免生产者和经营者互相推诿责任，以及确定管辖法院时，避免管辖权异议以更加有力地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但有部分同行认为，如发生家用汽车消费维权争议，且因家用汽车的质量缺陷造成人身、他人财产损害时，消费者仍可依据《产品质量法》等规定，将选择向生产者、销售者主张权利。

包修期和“三包”有效期。家用汽车包修期限不低于3年或者行驶里程60000公里，“三包”有效期限低于2年或行驶里程50000公里，以先到者为准。包括期内出现产品质量问题，可以免费修理，在“三包”有效期内，如果符合规定的退货条件、换货条件，消费者可以

凭“三包”凭证、购车发票办理退货或换货手续。

可以修理的情形。汽车出现产品质量问题（如出现影响正常使用、无法正常使用、产品质量与法规和行业标准不一致、企业明示的质量状况不符合等情况），可以要求销售者进行车辆维修。

可以更换的主要情形。一是销售者开具购车发票之日起60日内或者行驶里程30000公里之内，发动机、变速器的主要零件出现产品质量问题，消费者可以选择免费发动机、变速器；二是“三包”有效期内因产品质量问题修理时间累计超过35日，或者因同一产品质量问题累计修理超过5次的，消费者可凭“三包”凭证、购车发票，由销售者负责更换；消费者符合更换条件的，销售者应当及时向消费者更换新的合格的同品牌同型号家用汽车产品；如果没有同品牌同型号家用汽车产品更换的，销售者应当及时向消费者更换不低于原车配置的家用汽车产品。

可以选择换货或者退货的情形。符合下列情形之一，消费者要求更换或者退货的，销售者应当负责免费更换或者退货：1、家用汽车产品自销售者开具购车发票之日起60日内或者行驶里程30000公里之内（以先到者为准），家用汽车产品出现转向系统失效、制动系统失效、车身开裂或燃油泄漏；2、“三包”有效期内因严重安全性能故障累计进行了2次修理，严重安全性能故障仍未排除或又出现新的严重安全性能故障的；3、“三包”有效期内因发动机、变速器累计更换2次后，或者发动机、变速器的同一主要零件因其质量问题，累计更换2次后，仍不能正常使用的（发动机、变速器与其主要零件更换次数不重复计算）；4、“三包”有效期内转向系统、制动系统、悬架系统、前/后桥、车身的同一主要零件因其质量问题，累计更换2次后，仍不能正常使用的；5、“三包”有效期内，符合更换条件，销售者无同品牌同型号家用汽车产品，也无不低于原车配置的家用汽车产品向消费者更换的，消费者可以选择退货。

退货时的车辆使用合理补偿。在退货时，如果销售者已经对车辆进行了实际使用的，应当向销售者予以合理的补偿。计算公式为：车价款×行驶里程÷1000×补偿系数=合理补偿款。补偿系数由生产者根据家用汽车产品使用时间、使用状况等因素在0.5%—0.8%之间确定。

家用汽车消费维权注意事项

一是消费者一定要注意保管好购车发票及“三包”凭证。家用汽车“三包”规定第31条明确规定：“在家用汽车产品包修期和‘三包’有效期内，无有效发票

和‘三包’凭证的，经营者可以不承担该法规所规定的‘三包’责任。”如“三包”凭证不小心弄丢了，可以向销售者、生产者提出补办申请，销售者、生产者应当在收到消费者的补办申请后10个工作日内予以补办。

二是家用汽车在包修期以及“三包”期内进行转让的，“三包”责任仍然应当由销售者承担。家用汽车“三包”规定第27条第三款明确规定：“在家用汽车产品包修期和‘三包’有效期内发生家用汽车产品所有权转移的，‘三包’凭证应当随车转移，‘三包’责任不因汽车所有权转移而改变”。

三是应掌握解决纠纷的多种途径。消费者可以通过与经营者协商解决；向各级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等第三方社会中介机构请求调解解决；向质量技术监督等行政部门申诉；可依法申请仲裁或向法院起诉。上述解决纠纷的方式没有先后之分，由消费者自行选择行使。

需要说明的是，笔者认为，关于汽车产品质量争议的举证责任，以谁主张谁举证的一般举证分配原则为基本出发点。考虑到各方当事人举证能力的大小及难度，从保护消费者权益角度出发，在汽车产品质量争议中应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如消费者认为汽车存在产品质量问题，而销售者认为汽车没有质量问题的，应当由销售者就汽车的产品质量承担举证责任，否则由销售者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对此，2014年3月15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修正案）第二十三条第三款就明确规定“经营者提供的机动车、计算机、电视机、电冰箱、空调器、洗衣机等耐用商品或者装饰装修等服务，消费者自接受商品或者服务之日起六个月内发现瑕疵，发生争议的，由经营者承担有关瑕疵的举证责任。”据此，我们可以理解为，家用汽车自购买之日起六个月内发生质量争议的，销售者应承担举证责任。笔者认为，从保护消费者权益角度出发，在产品

质量举证责任方面法律应当对消费者有更多的倾斜，如可以规定“在家用汽车‘三包’有效期内，因家用汽车质量发生争议的，由销售者承担有关瑕疵的举证责任”。家用汽车“三包”规定还有很多需要补充和完善的地方，比如鉴定机构如何选定、法律适用上能否溯及既往等，都需要在司法实践中通过制定实施细则、司法解释等方式予以进一步地明确。

企业知识产权法律风险之防范

文 北京市隆安（深圳）律师事务所 刘志伟律师

企业知识产权至少包括三部分：专利、商标及版权。这三部分构成了企业知识产权的基本内容，是国家认定高新技术企业的必备条件之一，也是企业知识产权保护的核心。律师为企业提供良好的法律风险防范服务，不但应当站在法律的视角看经营——发现风险；更应该站在经营角度活学活用法律——规避风险。本文将深度剖析近年来发生在版权领域内的典型案例，从专业律师的视角分析企业经营者应当如何防范企业知识产权法律风险，帮助企业寻求防范版权法律风险之道。

版权主体及权利形成时间的确定

【案例一】美国著名灯具公司布隆姆伯格工业有限公司向被告中山市巨光灯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山巨光公司）和被告北京巨光照明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巨光公司）提起的侵犯版权纠纷案。原告美国布隆姆伯格工业有限公司自1993年以来几乎每年发行一本产品图册，对其新设计生产的灯具产品进行宣传、展示和推广。该公司将其产品图册和产品图册中的部分艺术灯具产品在美国进行了版权登记，对其产品图册及艺术灯具产品享有版权。中山巨光灯饰公司是国内一家较大型生产灯具的公司。自2004年起，该公司印制了两本产品宣传图册。该两本产品宣传图册被控严重抄袭了原告产品图册中的产品图片，共达479张。北京巨光照明公司则被控销售了与原告享有版权的艺术灯具产品相同或相似的灯具产品，这些灯具产品的底座上均有中山巨光灯饰公司的生产合格证。但中山巨光灯饰公司否认这些产品是其生产的，北京巨光照明公司也主张其是从案外人处进货，但其进货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观点。一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原告提交的1993-1997年、1999-2003年和2005年印制和发行的产品图册上均有原告的署名和版权标记，特别是原告还对1999年及2005年的产品图册在美国版权局进行了版权登记，上述证据均经公证、认证，原告提交的证据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要件，原告也尽到了证明其对上述产品

图册享有版权的举证责任。一审法院认定原告对所诉产品图册以及产品图册中的产品图片享有版权，受我国著作权法保护。中山巨光公司自己提交的产品图册，封面、封底上使用的图片与原告享有版权的产品图册上其中两张图片几乎相同，已经构成侵权。在该本产品图册中有402张产品图片，与原告享有版权的1993-1997年、1999-2003年产品图册中的部分产品图片相同或相近似，中山巨光公司在产品图册中剽窃了原告的作品，侵犯了原告所享有的版权，中山巨光公司应承担停止侵权、公开赔礼道歉、赔偿损失及诉讼合理支出等法律责任。^[1]

案例一所述的侵权事实具有普遍性，是企业现实经营中出现的最为普遍的侵权现象之一。然而，权利人能够通过诉讼维权并胜诉的案例并不多。在类似的案例中，权利人往往无法提供足够的证据证明版权主体及权利形成的时间。本案原告能赢得诉讼的关键在于原告对公司版权法律风险进行了有效的防范：“原告还对1999年及2005年产品图册在美国版权局进行了版权登记。”作为权利人对公司享有版权的图片等资料及时进行了版权登记，并且中国与美国同为《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的成员国，原告对其发行的历年版的产品图册所享有的版权同时受到中国法律保护。版权登记成为认定原告系版权主体及权利形成时间的有力证据，为原告赢得诉讼奠定了坚实基础。

版权登记对于版权诉讼极为重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之规定，著作权的产生采取自动保护原则，即作品一经创作完成，著作权即告产生。作为权利人的作者完全不用通过登记的方式来说明本人系作者的事实。但是版权侵权纠纷一旦发生，作为权利人往往无法提供足够的证据证明企业或者个人系版权权利人及权利形成时间等重要事实，那么在诉讼中将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通过本案例，企业要重新认识版权登记对于防范企业版权风险的重要性，改变一贯“只设计、不保护”的现状，甚至不经审查任意使用他人图片的行为。如果侵权行为成立，企业不但要承担民事赔偿

[1] . 见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06)二中民初字第13661号民事判决书。

责任，而且还要承担原告支付的律师费，后者是一般民事案件所没有的民事责任。如果侵害了他人人身性的权利，如署名权、修改权等，则可能还要承担赔礼道歉、消除影响的民事责任。

除了通过版权登记的方式确认版权主体及权利形成的时间之外，还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来确认版权主体。例如照片的底片、电子签名、将底稿发送到通用邮箱等都是有效且便捷的保护方式。只要版权主体及权利形成的时间能够确定，权利证据就获得了司法保护的基础。作为权利人，如果不能证明版权主体及权利形成的时间，权利也就无法得到司法的保护。

版权价值及风险

【案例二】原告上海恒昊玻璃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称恒昊公司）诉被告北京美通世家建筑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称美通公司）侵犯版权一案。原告诉称，2006年7月6日，原告将该图形作品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了一项名称为“玻璃（羽扇斑斓）”的外观设计专利，同时，原告通过受让的方式成为该图形作品的版权人，被告未经权利人允许使用与原告享有版权的图形作品相同图形的玻璃产品，已构成对原告版权的侵犯。一审法院认为，原告自郑州恒昊玻璃技术有限公司受让取得了“羽扇斑斓”作品的版权，受我国著作权法保护。原告“羽扇斑斓”作品为图形作品，被告销售的“霓裳之舞”玻璃产品上使用的图形与原告享有版权的作品图形相同，构成对原告作品的剽窃，且该使用行为未经著作权人许可也未付报酬，因此属于侵犯原告版权的产品。^[2]

案例二的典型意义在于版权发挥了类似专利的价值。在专利权未授权的情况下，权利人利用版权维护了企业的合法权益，同时实现了享有版权的价值。事实上，权利竞争是知识产权领域经常发生的现象，作为企业应当在必要的时候发挥权利竞争给企业带来的利益，积极发挥企业无形资产的作用，使企业的利益能够得到最大限度的保护。

值得引起注意的两个案例

【案例三】震旦（中国）有限公司（下称震旦公司）诉北京世纪京泰家具有限公司（下称世纪京泰公司）侵犯版权一案。一审法院认为：震旦公司的涉案外观设计专利权终止后，因该外观设计专利的立体视图及主视图属于我国著作权法所称的图形作品，故震旦公司可以就该视图主张版权。一审法院同时认为，根据本案公证书等证据，可以认定世纪京泰公司在涉案外观设计专利权终止后，实施了按照该专利的立体视图及主视图制造、销售涉案“京泰金爵矮柜WD301”产品及对该产品拍照并上传于互联网的行为。但是，世纪京泰公司此行为不属于版权性质的复制或使

用，法院认为震旦公司关于世纪京泰公司行为构成对其涉案外观设计专利的立体视图及主视图的版权侵害的主张缺乏依据，故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3]

本案例与上述案例二有类似之处，但权利人的主张没有得到法院的支持。在笔者看来，该案例的结论值得商榷：外观设计之视图既然属于著作权法意义上之图形作品，但为经济利益的需要使用该图形作品的制造行为却又被认为是著作权法意义上的复制，不能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此种情形下，该案中版权的存在对于权利人来说也就失去了其应有的价值和意义。外观设计之视图的版权价值被束之高阁，其对立体产品的价值被完全忽略，这样的结果对于版权人来讲是不公平的，也不利于智力成果的传播。

【案例四】原告上海锦禾防护用品有限公司、上海锦泽诚工业防护用品有限公司诉被告顾菁、上海正帛服装有限公司、上海纪达制衣厂版权侵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一案，一审法院认为，1、本案争议服装设计图以及据设计图制成的样板、样衣是否受著作权法保护。服装设计图作为产品设计图是著作权法明文规定的作品形式，受著作权法保护。依据服装设计图制成的样板由领、袖、袋、上衣片、腰、裤片等分离的平面图块组成。作为从设计图到成衣的中间环节和必经途径，样板在争议服装的制作、生产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样板的制版工作是专业人员根据长期积累的经验和特定规格的要求在设计图的基础上完成的。样板源于设计图，是设计图的表达和演绎，但又不同于设计图。设计图反映了设计人员对服装整体的设计理念，而样板则融入了专业制版师对设计图的理解和认知，体现了制衣企业特定的成衣规格与工艺。制版师在制版过程中往往要通过初级纸样制作、试坯布、修改纸样等多个步骤才能形成最终定型的样板。可以说，样板汇聚了设计人员和专业制版师具有独创性的智力劳动，是专门为工业化生产成衣而制作的图形作品，也应当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根据以上分析，两原告对争议服装的设计图以及据设计图制成的样板享有版权，在权利受到侵害时依法受到保护。2、本案被告的行为是否构成对原告服装设计图以及样板版权的侵害。本院认为，我国1991年著作权法第五十二条第二款规定，按照工程设计、产品设计图纸及其说明进行施工、生产工业品，不属于本法所称的复制。但是，2001年修订的著作权法删除了上述规定。故现行著作权法关于复制的含义应当包括对作品从平面到立体的复制。但是，从平面到立体的复制，仅指美学或艺术表述部分的复制。一般的有独创性但不具备美感的设计图只能作为图形作品予以保护。按照这种一般设计图进行施工或制造产品，不涉及美学或艺术表述的复制，不属于著作权法意义上的复制，本案所涉服装设计图就属于这种情况。故在本案中被告

[2] . 见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07）二中民初字第9616号民事判决书。

[3] . 见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07）二中民初字第11323号民事判决书。

即使按照设计图生产成服装也并不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复制。而且从原告提交的证据来看,本院还不能确信各被告获取了服装设计图,并根据设计图生产成衣。故各被告的行为不构成对原告服装设计图版权的侵害。

如前所述,案例四所涉服装从设计图到成衣的中间环节和必经途径是样板。在工业化生产服装过程中,工人完全根据样板的形状与规格对布料进行裁剪,然后再对裁剪后的布块进行缝制并最终制作成服装。根据样板的形状与规格对布料进行裁剪实际上就是对样板复制的过程。被告在裁剪布料制作服装过程中完全复制了原告“99112连体防护服”的样板,故被告的行为构成了对原告服装样板著作权的侵害,被告对此应当承担相应法律责任。^[4]

律师观点

笔者现分别从法律及企业经营者的角度对上述案例进行评析:

第一,从法律的角度分析上述后三个案例,其争议之焦点都在于图形作品由平面到立体是否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复制。对此,案例四不但得出了结论,而且对其中法理进行了深入的论述,笔者基本同意案例四的观点。但是笔者同时认为,既然从设计图到成衣的中间环节和必经途径是样板,根据样板的形状与规格对布料进行裁剪实际上就是对样板复制的过程。那么,也就必然可以得出,对样板的复制必然是对设计图的复制。因为样板完全使用了设计图的智力成果,是对设计图在经济上使用原作的方式之一,无论有无证据证明,样板与平面到立体之间的中间过程是必然存在的,也是无法逾越的复制过程,完全属于公知的事实,这必然会得出对样板的复制即是对设计图的复制的结论。“有多少种可能的使用形式,作者就可能享有多种使用权。例如,《法国知识产权法典》第L123-1条规定,作者终生享有以任何形式使用其作品的专有权,并从中得到经济利益。”^[5]

版权是智力成果权,既然图形作品同样属于版权人的智力成果,那么,图形作品必然具有“独创性”,是版权人进行个人的智力创作的结果。通常来讲,版权财产权包括三类权利:复制权、传播权及演绎权。复制权是图形重要的权利属性之一。在复制的形式中,由图形到图形、由平面到平面的复制并不能体现图形作品的真正价值,图形作品更大的价值在于由图形到实物、平面到立体的复制。“如果说施工图的立体图还能被一部分(建筑界之外的人)人勉强看得出来是个‘建筑物’,那么施工图中的平面图则是外行人所完全看不懂的。拿了这样的图去印成书或者图画,不会有什么市场。但是,施工图却正是第三者(即设计师与建筑单位之外

的人)得以不费自己的精神劳动、白白使用他人创作成果的最关键的图。从这一点看,它应当受到比建筑表现图更高水平的保护。既然施工图的平面复制并没有什么价值,那么它所值得保护的,就是禁止他人将施工图(无论平面施工图还是立体施工图,作为‘图’本身,都是平面的)以立体形式复制,亦即禁止他人未经设计师许可按照施工图施工。”^[6]只有对图形作品进行平面到立体的保护,个人进行的智力创作劳动的目的才不会落空。在这个过程中不能否认复制过程中新产生的智力成果,但是也不能因此否认图形作品对后者的价值。对于图形作品的使用,特别是由平面到立体的使用,应当支付对价以体现图形作品的价值。

第二,从企业经营者的角度观察,与案例三相比,案例二、四显得那么幸运,这是因为法律界对相同的事实并没有得出统一的结论。这对于企业来说是最大的风险,因为法律的不稳定性导致企业无所适从,不能根据法律和司法判决来决定自己的行为。这也给企业的版权法律风险防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为任何权利都不是万能的,都可能受到侵害,希望通过版权来保护企业的所有利益的目的将可能落空。在此情形下,企业需要更多的途径和方式对企业的知识产权进行保护。

笔者认为:要想使版权发挥价值,企业必然要加强版权风险的防范,即在进行版权登记的同时,通过专利权等方式对企业无形资产进行双重保护,以形成企业的知识产权立体保护模式。这样可以有效防范版权风险,特别是在版权保护失效的情况下对企业合法权益进行保护。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版权纠纷的类型也在不断增多。特别是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版权权利在得到巨大扩张的同时,其利益被侵蚀的风险也大大增加。此外,《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系国际性条约,版权在任何缔约国都受到保护,也就是说,版权纠纷将由一国范围延续到全球范围,版权发生法律风险的概率急剧增加。同时版权纠纷又是最为复杂的纠纷,因为“有形财产的转移与无形权利的转移不是一回事。但受保护客体的转移,并不使该客体中所体现的版权随之转移。某部作品之所以成为受保护客体,仅仅是因为有版权在其中产生。客体与权利分属不同人所有,在实践中就使主体与客体分离了:版权的后继归属落在一方这里,而作品本身却落在了另一方那里。正因为如此,西方有不少版权学家及版权律师把版权学成为鬼学——在版权领域,灵魂真的离开躯壳而存在了。”^[7]正因为如此,企业丝毫不能放松或忽视对版权的保护的价值,在经营过程中,企业应当尽早建立专业、完善、立体的版权保护模式,从根本上防范企业知识产权法律风险。

[4].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5)浦民三(知)初字第53号。

[5]. 吴汉东等著:《知识产权基本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3月第2版,第101页。

[6]. 郑成思著:《知识产权论》,法律出版社,2007年9月第1版,第181页。

[7]. 郑成思著:《版权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7月第1版,第360页。



拍案说法

从张昌年案反思我国职业病诊断与保障制度

文 广东君一律师事务所 管铁流律师

典型案例

2013年8月8日发生于山东省卫生厅内的一宗劫持人质案，再次将“尘肺”、“职业病”这类“小众”概念嵌入公众视线。与之前开胸验肺的张海超不同的是，这一次，肺病患者张昌年没有自残，而是将犀利的刀锋指向了女上司。让人倍觉忧虑甚至荒唐的是，张昌年也曾经想过效仿张海超，但因为考虑到再次开胸验肺很难再获当年的效果，最终没有实施。而此次劫持人质，张昌年的动机居然是要求与媒体对话。不难发现上述两人的出发点是完全相同的：要求治病，要求诊断，要求职业病社会保障。这几乎是一个无力更无声的底层弱势劳动者所惟一能有的突破方式了。

究竟是什么，让张昌年铤而走险，采取这样一种近乎“作秀”的极端方式来寻求救济呢？

遍查网络，所能搜集到的有关张昌年的信息也极为有限。仅有的资料显示，张昌年于2009年入职青岛安品精密机械有限公司，先后从事打磨、导轨切断等工作，工作时会接触粉尘。2012年3月张昌年出现发烧等症状，并很快恶化，出现气胸，体重明显下降，发布的微博中有咳出黑色粉末痰液的照片及车间余留粉尘场景等内容。另有报道称，张昌年在诊断过程中，有同事因为其作证遭到老板威胁。2012年6月20日，该微博发布鲁（青）卫职鉴字[2013]03号职业病诊断鉴定书的内容，并称依据《尘肺病诊断标准》（GBZ70-2009），张昌年被鉴定为“无尘肺”。

张昌年被媒体关注，已不是第一次。2013年因为病情恶化，山东当地媒体对其亦有报道并有热心市民捐助数万。与已经花费的30余万巨额医疗款相比，这些捐助不过是杯水车薪。张昌年最终还是选择了劫持人质这种方式来寻求媒体和社会的关注。结合现有的网络信息我们发现，张昌年是在向山东省卫生厅申请最终鉴定时与人质发生纠纷的，而在此前的诊断与首次鉴定中，张昌年认为单位并未如实提供其在职期间的职业危害因素的信息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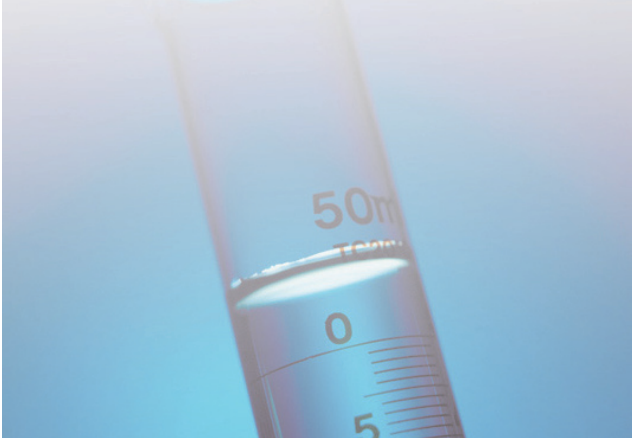
此案随后很快得以平息，张昌年在如愿以偿地通过媒体发

声之后，非常顺从地放弃了劫持。此后不久，张昌年即被诊断为职业病。

律师分析

不了解职业病诊断程序的朋友，可能很难想像职业病患者对用人单位不提供或者不如实提供诊断鉴定所需材料的无奈、苦恼乃至愤怒。毫不夸张地说，用人单位是否提供与如何提供诊断鉴定素材，将直接关系着职业病患者的生死存亡。

这里，有必要简要介绍下现行职业病诊断鉴定制度。依据2011年修正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以下简称“《职业病防治法》”），我国职业病诊断鉴定制度实行专门机构的一次诊断两次鉴定，过程中劳动者需要对自己的职业接触史如实陈述，并在相关用人单位否认时需要存在劳动关系加以证明，而职业危害因素存在的相关信息则由用人单位提供，当单位拒绝提供相关材料时，诊断鉴定机构可依据已有的材料直接作出诊断鉴定，或者提请安全生产监管部门进行调查和判定。对首次诊断结论不服者，可向诊断机构所在地设区的市级鉴定机构申请首次鉴定，对首次鉴定结论不服，还可向省级鉴定机构申请再次鉴定。按照国家卫生部的有关规定，再次鉴定即为最终鉴定。这种诊断鉴定程序，旁人看来似乎应该有效。但经历过诊断鉴定的患者们，绝大多数可谓充分领教了其



中隐藏的种种障碍。

劳动关系存在与否问题乃是首要障碍。如果说修正前的《职业病防治法》还没有将这个问题凸显，该法的修正反倒让劳动关系的确认成为出现在很多职业病人求诊路上的头只拦路虎。正因为如此，在《职业病防治法》修正之前，诊断机构在诊断时往往并不特别追究患者与特定单位之间的劳动关系是否粗在，而修正后的该法第五十条则将劳动关系确认问题明文列出。虽然如此规定会有让职业病诊断过程中的劳动关系从台下摆到台面上的好处，但由此引发的另一个极端后果恐怕会令立法者始料未及，那就是但凡碰到当事一方提出异议（更多的是用人单位对岗位的工作内容存在不同理解和主张，而非对劳动关系提出异议），诊断机构即要求患者启动劳动仲裁程序，以裁定争议。仲裁后可诉讼，一审后还可二审，等劳动关系真正有个结论，黄花菜可能都凉了。

其次就是职业危害因素资料的提供问题。按《职业病防治法》第四十八条、四十九条的规定，此类资料主要应由用人单位提供。但我国很多法律的一大特点就是有权利无救济，或者说有宣示无后果。理论上说，用人单位需要而且是“应当”提供相关资料，但用人单位不提供又会怎样？法律规定却没有下文。有些用人单位是无论怎么催促也拒不提供，有些单位是虽提供了资料，但所提供的资料却根本不能客观反映患者正常工作时所接触到的有毒有害因素状况：要么避重就轻，只提供危害较轻的资料；要么提供与患者症状无关的资料，甚至有的直接作假，提供虚假材料。

对此，修正后的《职业病防治法》规定，用人单位不提供或者不如实提供职业危害因素资料的，诊断鉴定机构可以结合现有材料直接作出诊断结论，或者提请安监部门由其责令用人单位提供或者直接进行现场调查。由此抛给职业病人的难题是：用人单位违法，患者还可以找行政主管部门申诉，若行政主管部门不作为，该如何是好？

理论上我们可以去交涉、督促、投诉、申请行政复议甚至行政诉讼，但对于患者而言，尤其是当病情严重得连下一次呼吸都存在风险时，他们又如何享受得起这些“高傲而奢华”的程序权利？

与之密切相关的是，现行职业病诊断制度实行一次诊断两次鉴定以及鉴定终局模式。正是这样一种设计，使职业病诊断鉴定几乎成为不受外界监督的封闭操作。诊断鉴定究竟采用了哪些材料、运用了哪些科学及法律依据？其缘由患者一概不知，社会公众也根本无从了解。即使你想申请信息公开，而此类信息却并不属于可公开的政府信息内容。这是职业病患者维权路上的第二只拦路虎。

而另一方面，职业病名录法定制度使很多疾病尽管无法排除职业危害相关性，却因为现有名录中缺少对应的病种，而诊断鉴定机构为谨慎考虑不敢或者不愿作出职业病的诊断结论。本文中张昌年虽然最终被诊断为职业病，但诊断机构给出的职

业病名称（职业性变态反应性肺泡炎）与张昌年实际的病情其实并不完全相符。

最后一个障碍，与现行职业病和一般工伤实行统一的工伤保险模式有关。职业病的诊断鉴定结论，将直接决定患者能否被认定为工伤，以及紧随而来的能否享受到相应的工伤保险待遇甚至是有关的民事赔偿。若诊断为职业病，患者不仅基本不愁后期治疗费用，而且还能享有一份大致维持原有收入的伤残津贴。反之，则一切费用都得自行承担。从这个意义上说，职业病诊断鉴定直接关系着患者的生死存亡，将最终决定着患者天壤之别的未来。而如此至关重要的法定确权行为，却始终没有法律专业人士的介入。

张昌年劫持求得正确诊断的遭遇，不过是无数求诊受阻的职业病患者的遭遇之一。只不过因他这冲动也好无奈也罢，总之是豁出去的行为，公众才再一次看到了似曾相识的职业病、尘肺这样的字眼，但对这些字眼背后经年累月的压抑、屈辱、生不如死的病痛乃至家破人亡的求医维权历程，社会上真正理解的人不多，能用心倾听并有意伸手推动改变者更少。此案曝光后，网友@茸茸_P发出微博：“王克勤老师为尘肺病人奔走多年，还有陈坤这样的巨星帮忙宣传，社会反应始终寥寥，一个尘肺病人为鉴定病情劫持人质，马上就登上媒体头条，为什么弱势群体的唯一出路是犯罪呢？”寥寥数语，道出此中多少荒唐与无奈。

没有人会愿意走上开胸验肺或者劫持人质这样的道路，也没有人会甘心选择效仿张海超或者张昌年，更没有人会支持甚至鼓励张昌年们动辄采取极端行动，职业病诊断歧途上的“二张”事件，不过是不合理的职业病诊断制度乃至整个职业病防治保障制度运行中的一次偶发性溃疡，但就算是再小的溃疡，倘使不加以重视而任其自生自灭，其后果可能是溃疡不断发展、恶化。

是时候反思现行的职业病诊断与保障制度了！

法律建议

建立职业病专项保障基金制度。若存在有毒有害因素，用人单位应于设立之时预存风险保障费用，劳动者一经发现职业病，则自动终生享受该专项保障费用，若无重大职业卫生侵权过错，用人单位缴交此保障费用后不再承担职业病人民事赔偿责任。

建立职业病诊断鉴定的信息公开制度。对诊断鉴定所依据的材料（职业危害信息、流行病学资料、参考资料等）依申请适当公开。

建立职业病鉴定的司法救济制度。对职业病再次鉴定结论进行法律评价，审查诊断鉴定中所依据的材料及所确立或排除的因果关系是否合法。

明确并强化职业病损害赔偿与惩罚制度。对存在明显过错的职业病案，根据其过错程度，对用人单位处以民事赔偿、行政处罚乃至刑事处罚之责任，加重其违法成本。



法律实务

浅析迟延履行非主要债务能否解除合同

文 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 谭卫山律师

甲方在二审中强调的“在乙方提供自检报告的基础上，甲乙双方签订了预验收报告后，乙方方可对产品进行包装，并协助甲方装卸和运输”合同条款应为本案最关键的适用规则以及甲方拒绝接受的诉讼理由，二审法院却仿佛视而不见。故作此文与律师同仁进行学术交流，探讨究竟迟延履行非主要债务能否解除合同问题。

案情简介

北京某公司（甲方）与天津某公司（乙方）于2013年1月16日签订了《采购合同》，约定甲方设计图纸交乙方加工制作振动台，技术要求中约定“甲方在乙方现场验收时，乙方应对振动台外侧全部焊缝进行探伤，在未封底板前，对振动台内部焊缝，全部进行探伤，并出具探伤报告”，“焊接完成后，应进行热处理以消除焊接应力，并出具热处理报告”，“热处理时，乙方提前通知甲方，甲方需在现场”。验收条款中约定了乙方需提交的验收资料为焊工资质证、焊条合格证、钢材质量证明书、油漆合格证、热处理报告、主要部件尺寸检查表、出厂合格证、探伤报告、其他质量证明资料共9项。进度条款中约定“乙方需保证在2013年3月15日之前全面完成台面制造，加工完成后乙方通知甲方到现场对零部件的加工质量进行最终验收确认并出具验收报告。在乙方提供自检报告的基础上，甲乙双方签订了预验收报告后，乙方方可对产品进行包装，并协助甲方装卸和运输”。

合同签订后，甲方按照合同约定支付了预付款，并在接到通知后，于2013年2月20日到乙方公司进行未封底板前的验收，乙方当场未出具探伤报告；甲方再次接到通知后，于2013年3月5日到乙方公司进行热处理的验收，乙方当场未出具探伤报告。2013年3月20日，乙方通知甲方振动体制作完毕，之后甲方要求乙方提交全套验收资料并于2013年4月7日收到乙方邮寄的验收资料。2013年4月8日，甲方向发出邮件要求解释为何探伤报告、热处理报告的出具时间分别早于振动台内部全部焊接时间、外部全部焊接时间（也即焊接尚未完工，

乙方即出具探伤报告和热处理报告），乙方未回复上述邮件，反而通知甲方如果不提货则将收取库存费。2013年5月3日，甲方委托律师事务所向乙方发送律师函，要求解释验收资料中的疑点，若未合理解释则将解除合同。乙方仍未回复，甲方于2013年5月16日委托律师事务所向乙方发送律师函通知解除合同。甲方表示，验收报告存在诸多疑点，且上述疑点与振动台的制作质量是否符合合同约定息息相关，在乙方未合理解释上述疑点的情况下，甲方有理由认为乙方制作的振动台不符合合同约定的质量标准，根据合同法第一百四十八条之规定，甲方解除合同，要求退还预付款。

审判情况

一审庭审时，乙方辩称其邮寄的验收资料仅是样本，并于2013年7月5日当庭提交了探伤报告、热处理报告。一审法院认为“被告应在邮寄上述二份报告时附相关的文字说明，或在原告产生质疑后的合理时间内给与必要的解释，被告对此采取置之不理的处理方式欠妥。综上，被告履行合同行为存在瑕疵，但尚未构成根本违约”，甲方不能仅凭验收资料存疑即认定振动台质量存在问题，据此判决驳回甲方的诉讼请求。

甲方收到一审判决后，认为一审法院不当分配了举证责任：根据合同中“在乙方提供自检报告的基础上，甲乙双方签订了预验收报告后，乙方方可对产品进行包装，并协助甲方装卸和运输”的约定，乙方首先得提交其验收资料证明其制作完工的振动台符合合同约定的质量要求，甲方才负有接受振动台的责任和义务；在乙方未提交验收资料或者验收资料存有疑

点的情况下,甲方可以拒绝接受振动台;经两次催告后乙方至今未向甲方提交全套的验收资料,甲方有权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第(四)项之规定解除合同。据此,甲方向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二审法院认为甲方已经派遣具备专业技术的工程师到加工现场对振动台的探伤、热处理工序进行了验收,双方当场未提出异议,说明其对上诉人的制作工序认可,振动台的探伤及热处理均符合合同的约定。“关于上诉人主张的被上诉人逾期提交质量合格证明,不足以证实振动台确实存在质量问题,亦不足以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且上诉人对振动台质量提出异议的依据,仅是验收报告的具体时间存疑,而对于验收报告的具体内容未提出异议,也未提交确实的证据证实振动台本身存在质量问题,因此上诉人对振动台质量提出的异议不能成立”。关于合同法第二百六十八条规定的定作人可以随时解除承揽合同的权利,二审法院认为“因被上诉人乙方已经完成了振动台的全部制作,并于2013年3月20日通知上诉人甲方验收,但上诉人在其派出的工程师验收无异议,亦无确实证据的情况下,仅因验收报告出具时间存疑,便急于行使其验收的权利,并以振动台不符合合同约定的质量标准为由,于2013年5月16日提出解除合同,其行为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据此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律分析

一是提交验收报告的义务属性问题。一般认为,主给付义务是合同关系所固有的、必备的,直接影响到当事人订立合同的目的,例如合同法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的“出卖人应履行向买受人交付标的物或者交付提取标的物的单证,并转移标的物所有权的义务”。从给付义务是为了辅助主给付义务而设立的义务,例如合同法第一百三十六规定的“出卖人应当按照约定或交易习惯向买受人交付提取标的物单证以外的有关单证和资料的义务”。附随义务是债务人依诚实信用原则于契约及法律所规定的内容之外所附有的义务,例如合同法第六十条规定的“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一般认为,从给付义务与主给付义务都可以独立诉请履行,而附随义务不可单独诉请履行。本案从合同约定“在乙方提供自检报告的基础上,甲乙双方签订了预验收报告后,乙方方可对产品进行包装,并协助甲方装卸和运输”中不难看出,乙方提交验收报告系从给付义务,辅助于交付振动台这一主给付义务,该项义务并非基于诚

实信用原则,而是基于合同当中的明确约定,而且甲方可以独立诉请乙方提交验收资料,因此,本案乙方提交验收报告不属于附随义务。

二是未提交验收报告能否解除合同问题。既然提交验收报告属于从给付义务,那么甲方还能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解除合同吗?表面上看,提交验收报告不属于上述条款的“主要债务”,甲方不能根据上述条款解除合同,其实不然。从合同约定“在乙方提供自检报告的基础上,甲乙双方签订了预验收报告后,乙方方可对产品进行包装,并协助甲方装卸和运输”中“方可”一词不难看出,只要乙方不提交验收资料,甲方则可以拒绝接受货物,也即乙方交付振动台的主给付义务和提交验收报告的从给付义务是捆绑在一起的,只要从给付义务未履行或迟延履行,则主给付义务因未达到条件而无法履行或需要顺延履行。本案中,乙方虽然提交了验收资料,但是甲方提出了合理的怀疑(焊接尚未完工,乙方即出具探伤报告和热处理报告),要求其进行解释,但乙方未予理睬,并在一审庭审时辩称其之前提交的验收资料为样本,并针对甲方提出异议的两份验收资料,又当庭提交了两份与第一次验收资料不同的验收资料。应该说,乙方两次提交验收资料都属于迟延履行,第一次提交的验收资料存有疑点,根据合同“甲乙双方签订了预验收报告后,乙方方可对产品进行包装,并协助甲方装卸和运输”之约定,甲方有权利提出合理的怀疑,乙方不解释合理怀疑属于迟延履行;第二次提交的验收资料仅有两份,其他七份验收报告均未提交,也属于迟延履行。

在甲方发函要求解释验收资料时,乙方解释验收资料或者补交验收资料的合理期限应该比较短,否则就只能说明其事先并未按照合同约定的振动台制作、验收工序进行制作和验收。但是,甲方自2013年5月3日律师函发出后,直到2013年7月5日乙方才提交两份补做的验收资料,如果以乙方第一次提交的验收资料为准,则其至2013年9月13日二审庭审时也未解释验收报告中的疑点,直接产生其至二审庭审时未履行向甲方交付振动台这一主给付义务的后果,明显超出了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合理的期限;如果以乙方第二次提交的验收资料为准,因其第二次仅提交了两份验收资料,至二审庭审时也未提交全套的验收资料,也产生其至二审庭审时未履行向甲方交付振动台这一主给付义务的后果,明显超出了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合理的期限。综上,笔者认为,乙方提交验收报告虽属于从给付义务,但会导致交付振动台这一主给付义务无法履行,其逾期提交验收报告直接产生了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的后果;甲方向乙方发出了催告函,乙方在合

理期限内仍未提交排除合理怀疑的验收资料或全套验收资料，并进而导致在合理期限内无法交付振动台，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甲方有权解除合同。

但二审法院对甲方提出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解除合同的理由未做任何回应，却回应了甲方主张的乙方逾期提交验收资料的问题，认为该行为不足以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甲方不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一款第（四）项而解除合同。应该说二审法院在判决说理方面是较为欠缺的，这种不说明理由的判决即使在实体上是公正的，也难以让当事人服判息诉（甲方已决意申请再审）。笔者认为，根据合同“在乙方提供自检报告的基础上，甲乙双方签订了预验收报告后，乙方方可对产品进行包装，并协助甲方装卸和运输”的约定，不难得出只要乙方不提交验收资料，甲方就可以拒绝接收货物的结论。乙方在2013年9月13日二审庭审辩论终结前仍未向甲方解释验收资料中的疑点或者提交全部的验收资料，与合同交货时间2013年3月15日已相差近半年（合同约定的交货期为2个月），即使其能在二审庭审时交付振动台及全套排除合理怀疑的验收资料，但此时交付对甲方明显已毫无意义，可以认为其逾期提交验收资料导致甲方合同目的无法实现。

三是二审能否变更一审诉讼理由。本案甲方一审主张以振动台质量存在问题而解除合同，二审主张乙方逾期交付而解除合同，二审法院在判决书中虽未对当事人变更诉讼理由是否属于法院审查范围作出说明，却简短地回应了甲方二审的诉讼理由，应视为其对二审变更诉讼理由是持允许态度的，这里不妨探讨一下当事人在二审诉讼中能否变更一审诉讼理由这一问题。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百八十四条之规定，当事人在二审程序中变更诉讼请求的（效果上相当于增加独立的诉讼请求），二审法院如果调解不成应告知当事人

另行起诉，也就是说二审不能变更诉讼请求，理由在于二审法院如果对增加或变更的诉讼请求进行审理，会导致增加或变更的诉讼请求仅在一个审级中就作出了终审判决，违反了我国民事诉讼法确立的两审终审制度。但是，变更诉讼请求与变更诉讼理由存在显著的区别，前者从一个诉讼请求变更到了另一个诉讼请求，已经形成了新的诉讼，因有违两审终审制，故在二审中对增加或变更的诉讼请求不予审理。后者是在诉讼请求不变的前提下变更诉讼主张或理由，二审不得将变更后的诉讼理由排除在审理范围之外。理由是：第一，如果二审法院因变更诉讼理由而告知当事人另行起诉，则当事人起诉后的诉讼请求仍与之前一致，法院会以“一事不再理”而不予立案或者驳回该当事人诉讼请求；第二，我国民事诉讼法对一审之后提交的新证据也予以审查，对没有出现新的证据而只是依据一审证据提出新的主张和理由则更应该予以审查。

律师体会

作为本案甲方的代理律师，笔者对二审判决理由及结果心存疑问。关于现场验收是否表示甲方对振动台质量无异议的问题，笔者认为，根据合同条款应不难理解现场验收仅是检查焊接工作的表面瑕疵，不然合同中则不会要求乙方提交验收资料，而且还约定不提交验收资料则不能完成交货。关于验收资料存有疑点且乙方两次提交验收资料的问题，二审法院仅仅认定是报告出具时间存疑，而否定了其验收行为违反了合同的工序要求（在焊接未完工的情况下即出具了焊接全部合格的证明），且对其二次提交验收报告涉嫌造假未作任何回应。甲方在二审中强调的“在乙方提供自检报告的基础上，甲乙双方签订了预验收报告后，乙方方可对产品进行包装，并协助甲方装卸和运输”合同条款应为本案最关键的适用规则以及甲方拒绝接受的诉讼理由，二审法院却仿佛视而不见。故作此文与律师同仁进行学术交流，探讨究竟迟延履行非主要债务能否解除合同问题。



编者按：2013年7月12日，我市刘运坤、刘雪坛、范国伟、张平、严世勇、黄庆春、金峰、贵铸8名律师（后四名为“1+1”中国法律援助志愿者行动2012年度优秀志愿律师）分别奔赴经济欠发达、律师稀少的贫困地区开展法律援助服务。如今，8名志愿律师已经在服务地工作逾半年。

“1 + 1” 法律援助半年印象

——2013年深圳志愿律师侧记

文 本刊编辑部

► 志愿律师刘运坤（广东佳田律师事务所）

服务地印象：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地处海南省的中西部。全县下设八个乡镇，总人口约26万，其中黎族占全县总数的三分之一，外来农民工人数已超过当地户籍人口数。当地的法律纠纷增多，斗殴、盗窃、故意伤害、未成年犯罪等违法犯罪案件逐年递增。目前，昌江县仅有一家合伙制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三名，乡镇法律服务所两家，所内法律工作者10名。

刘运坤律师已年近60岁，是2013年法律援助志愿律师中最年长的一位，但他强烈希望能到老、少、边、穷地区开展法律援助，因为他希望自己能“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做一些对社会有贡献的事情”。

半年来，他在服务地共接待来访188人次，来电15人次，开展下乡普法活动7次，发放法律宣传资料4500多份，下乡普法民众710余人次，开展法律培训100余人次，办理法律援助刑事案件12宗，民事诉讼案件5宗，非诉讼案件25宗，行政案件1宗，代写法律文书22份，为受援人挽回经济损失50多万元。其中刘运坤律师代理的羊某某“民告官”行政诉讼案在当地引起很大震动，当事人特地送来锦旗表示感谢，社会评价极高。“1+1”行动法律援助志愿者通讯第47期特刊报道了他的先进事迹：“在海南省服务的‘1+1’志愿律师叶红梅、刘运坤律师，在工作中表现出来的高度责任心和高水平职业素质，受到了当地司法局的高度评价。他们所带领的两位往届大学生志愿者，对两位律师老师表现出了由衷的敬佩。他们说：从志愿律师身上我们学到了终身受益的知识和精神。”此外，该通讯第46期亦对他的先进事迹进行了报道。他为自己题诗道：年近花甲人未老，法律援助心情好。

► 志愿律师刘雪坛（广东劳维律师事务所）

服务地印象：甘肃省和政县是国家贫困县，以农牧业为主，几乎没有工业。该县位于西部边远的农村地区，交通不便，信息不畅，经济落后，法律意识不高。当地许多青壮年文化程度较低，很多人连小学都没有读完，甚至很多连小学都没上过。民众普遍法律意识不高，邻里争执斗殴、不赡养老人、无证驾驶、酒后驾驶、吸毒贩毒、盗窃等违法犯罪现象不少。

刘雪坛是第四位来到和政县的志愿律师。到了服务地后，刘雪坛律师呼吁深圳律师向当地开展帮扶活动，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隋淑静律师、深圳市律师协会代秘书长王红积极响应，向该县捐赠了一批图书和学习用具。刘雪坛律师应邀到达浪乡开展法制宣传活动时，将图书和学习用具捐赠给达浪小学，得到该校师生的连声感谢。看着师生脸上洋溢的欢快笑容，刘雪坛律师深深感受到法律援助志愿律师的光荣和任重道远。

半年来，他接待来访群众300余人次，受理了12起法律援助案件。其中两起亲属、邻里纠纷令刘雪坛律师印象深刻，并深刻感受到当地民众法律意识薄弱。尽管“1+1”法律援助志愿者行动对该县的法律援助和普法教育工作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显然并不能解决当地律师人才短缺、群众法律意识薄弱的问题。他认为该县仅有一名公职律师，远远不能满足该县二十万人口的法律服务需要。归根结底，该县还是要立足本地区发展，大力开展普法宣传教育工作，培育本地优秀的法律服务人才，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发展律师业，才能为当地群众提供优质、专业的法律服务。

► 志愿律师范国伟（广东万鼎律师事务所）

服务地印象：新疆喀什市法律服务需求较高，具体

体现在建筑行业及矿山企业。作为南疆的中心城市，喀什市的维稳工作非常繁重，防止暴力恐怖事件更是当地政府的长期工作。2013年下半年喀什市周围县市暴恐事件不断，这使范国伟律师的法律援助工作蒙上了危险的色彩。

喀什市属于维吾尔族的聚集地区，大部分维吾尔族人不懂汉语，范国伟律师来到此地开展法律援助工作遇到最大问题就是语言障碍。在开展法律援助工作时，因为不懂维吾尔族语，他需要通晓汉语的维吾尔族同志担任翻译，并在法律援助工作之外认真学习维吾尔族语言。半年来，范国伟律师共办理了法律援助案件20余件，解答法律咨询120多人次，为喀什的和谐稳定构筑了一道坚固的防线。他认真勤勉的工作得到了当事人的普遍好评及有关部门的高度评价，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其中他承办的一起矿工工伤事故的家属还专程给范国伟律师送来锦旗。

这起矿工工伤事故发生于2013年7月底，受援人王某的丈夫在喀什某矿区作业过程中因车辆发生倾覆死亡。王某及其亲属与矿区承包方就事故责任和赔偿问题陷入僵局。王某及其亲属向喀什市法律援助中心寻求法律帮助。范国伟律师受理此案，为其提供法律援助。期间，王某及其亲属情绪激动，准备抬着死者遗体到政府有关部门上访。范国伟律师多次与矿区承包方进行谈判，同时对王某及其亲属进行了耐心细致的劝解。最终死者家属放弃偏激的方式，并与矿区承包方达成和解。此案中，范国伟律师通过非诉的途径平息了矛盾纠纷，避免了群体性上访事件发生，在维护喀什和谐稳定的防线上贡献了积极的力量。

在喀什市开展法律援助工作中，范国伟律师不免会遇到工作和生活方面的困难，但他始终相信自己一定能克服困难，充分发扬“1+1”法律援助行动的公益精神，在工作中为当事人提供更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为法治建设的发展作出积极的贡献。

►► 志愿律师张平（广东朗道律师事务所）

服务地印象：宁夏回族自治区彭阳县位于宁夏东南部边缘，下辖3镇9乡，156个行政村、4个居民委员会，总人口26.26万人。该县目前只有一家国资律师事务所，三名执业律师。

对张平律师而言，2013年是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他入选为“1+1”中国法律援助志愿者行动志愿律师。

彭阳县是个相对贫困的地区，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群众很多。自2013年7月17日到彭阳县开展法律援助工作至今，张平律师共接待法律咨询200人次，化解矛盾纠纷2次，开展法治讲座2次，办理刑事自诉

案4件，民事侵权案2件，案件办结3件，为受助人挽回经济损失逾2万元。

在法律援助工作中，张平律师有了更深刻的思索。张平律师发现我国法律援助制度对欠发达的西部地区群众权益保障有着积极的意义和作用。“1+1”法律援助志愿者行动令当地贫困群众不需支付律师费即可享受专业的法律服务，他们的经济损失得以挽回，他们的合法权益得到了维护。在承办法律援助案件时，志愿律师的身份使他在一定程度上比当地律师更具优势。

尽管如此，律师在开展法律援助工作时仍存在一些困难。承办一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时遭遇的阅卷难令张平律师的感受尤为深刻。他认为，法律援助工作仍然任重道远，法律援助律师的待遇和地位需要制度保障，社会需要一个完备的、系统的、运作良好的法律援助工作机制和具体、详细、可操作的法律援助制度。但张平律师表示，“尽管在办案过程中难免遇到问题，但一想到法律援助律师的责任和使命，心里便充满力量。”

►► 志愿律师严世勇（广东法鹏律师事务所）

服务地印象：山西省广灵县位于山西省东北边陲，永定河上游，北岳恒山东麓。全县辖2镇7乡180个行政村，国土面积1283平方公里，人口18.8万人，其中农业人口16万人。该县是传统农业县，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晋西北和太行山革命老区扶贫开发”战略实施重点县之一。

2012年，严世勇律师发现自己是广灵县唯一的执业律师。2013年，他自愿申请继续担任志愿律师，再度为该县提供法律援助工作。

严世勇律师努力克服交通、生活、语言等方面的困难，放弃了节假日休息时间，为当地群众和司法行政机关提供即时的无节假日的法律服务。半年里，他接待群众来访法律咨询135人次，参与5场法律宣传活动，开展4场专题讲座，受众逾220人次，受理法律援助案件21件，参与开庭19次，办结案件12件，为受援人挽回经济损失160余万元。

目前，在严世勇律师的努力推动下，在大同市和广灵县两级司法局的重视和支持下，一个律师事务所已经决定在广灵县开设分所，并将在2014年春节后正式挂牌。这将改变广灵县没有律师事务所的困境。

敬业、专业的严世勇律师不仅得到了当地群众的喜爱，更收获当地群众和政府的尊重。广灵县司法局和法律援助中心对严世勇律师给予高度评价，曾专门给深圳市律师协会和严世勇律师所在的律师事务所送

去了感谢信。成为志愿律师，严世勇律师放弃了很多，也付出了很多，但他说：“我决定在这条路上继续前行，继续弘扬法律援助志愿精神，感悟人生的快乐和真谛。”

► 志愿律师黄庆春（广东君孺律师事务所）

服务地印象：澄迈县位于海南岛的西北部，毗邻省会海口市，与广东雷州半岛隔海相望。该县是海南省农业大县，以产粮食为主，辖下有11个镇，3个国营农场，2个省直属农林场和1个省级开发区。

圆满完成2012年法律援助工作后，黄庆春律师被评为2012年度“1+1”中国法律援助志愿者行动的优秀律师。2013年他申请继续参加“1+1”中国法律援助志愿者行动。

半年来，黄庆春律师在澄迈县的主要工作是开展法制宣传讲座、接受法律咨询、办理法律援助案件，以专业的法律服务行走在群众之间，传播法律知识，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反躬自省，黄庆春律师认为他的法律援助工作完成情况较好。盘点他的半年工作我们发现，截至2014年1月，他在澄迈县共承办各类法律援助案件42件，其中刑事案件15件，民事案件27件；开展各种法制宣传活动8次；开展法制讲座15次；接待法律咨询597人次。其中，两次法律讲座、两次普法活动、两次刑事辩护分别被澄迈电视台、海南电视台、《法制时报》等媒体报道。其工作可以说非常努力，但面对赞誉他谦和地连声表示“仍有许多方面还存在不足，还需要继续努力。”

► 志愿律师金峰（广东深大地律师事务所）

服务地简介：广西银海区是广西北海市下辖的一个市辖区，总面积为475平方公里，辖区内有4个镇，常住人口约17.68万人。银海区农渔业生产条件较好，综合开发初具规模。

金峰律师是2012年度“1+1”中国法律援助志愿者行动的优秀律师，并获司法部“二等功”。

2013年3月代理的一起案件令金峰律师久久不能忘怀。当时，银海区上百户的瓜农种植的西瓜生长异常，瓜农集体上访。当地政府启动应急机制，对瓜农提供了紧急补贴。但因补贴不足以弥补瓜农损失，瓜农们拿到补贴后继续上访，要求追究瓜苗供应商的责任。警方迫于压力以非法经营罪将提供瓜苗的两兄弟抓捕。金峰律师被指派为瓜农提供法律援助。受理案件后，金峰律师发现该案件较为敏感，便想到调解的办法。但调解之路亦是艰难，群情激奋的瓜农和身陷囹圄的两兄弟在赔偿数额上意见有巨大反差，调解举

步维艰。近八个月的时间，过程充满各种困难和挫折，但金峰律师坚持耐心沟通，多次调解之后，双方终于达成和解协议，困扰市区两级政府的瓜农上访事件得以圆满解决。当地市委市政府对金峰律师所在区成功调解该上访事件给予了高度评价和肯定。金峰律师常常感到个体力量的不足，弱势群体需要更多来自政府和社会的支持与帮助。这个普通的群体性的案件，让他对这点有了更深的感受。

开展法律援助的时间里，金峰律师心里喜悦、迷茫、疲惫、辛酸、成就感、挫败感交织，但是无论如何，他始终认为“一名律师一生能有一次这样的体验，乃人生之幸。”

► 志愿律师贵铸（广东德城律师事务所）

服务地印象：墨江哈尼族自治县是全国唯一的哈尼族自治县，其中99.99%是山区，全县36万人口，只有两名社会律师，经济发展滞后，文化与法制建设薄弱，其中大多数的村民居住在山上，生活水平不能与内地其他发达地区同日而语，大多数的村民文化程度不高，法律意识薄弱。

开展法律援助工作一年半以来，贵铸律师走遍了墨江哈尼族自治县十四个乡镇，崎岖的山路、蜿蜒颠簸的乡村土路留下了他与当地司法机关工作人员的身影。下乡对村镇两级人民调解员开展法律培训、向当地乡村学校师生宣讲未成年人相关的法律知识、向广大的妇女宣讲婚姻家庭的法律知识……这就是他日常的工作。一年半以来，他共受理法律援助案件70余件，接待法律咨询逾千人次，开展法治讲座20余次，为服务地群众代写各类法律文书500余份。

在法律援助工作中，最令贵铸律师头痛的是当地居民多数文化程度不高，法律意识薄弱，甚至有些是法盲。在做调解工作时，贵铸律师与司法机关往往要数十次地讲解，方能令村民勉强理解最基础的法律规定和法律知识。即便如此，法律有时也无法解决问题，当地群众更倾向于用自己的认知来要求他人、处理社会关系，以自己认同的方式解决矛盾。遇到这种情况，除了耐心地、反复地向群众讲解法律知识，宣传法治理念，贵铸律师也只能配合当地村委会及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努力化解群众的矛盾。

贵铸律师始终为自己是一名法律援助志愿律师、能够为国家的法治建设贡献力量而感到骄傲。贵铸律师说：“今后，我还会尽自己所能努力推动当地法律服务业进一步发展和规范。如果可能，我会继续从事法律援助志愿服务，继续参加“1+1”中国法律援助志愿者行动。”



春在和风细雨中

文 自由撰稿人 宋伯航 刘希

(一)

淅淅沥沥的春雨，从明净的天空飘落而下，播洒大地，洒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解冻的土地终于迎来了年头的第一场春雨，复苏的原野尽情的吮吸着每一滴清澈的甘露，春雨默默地滋润着每一寸空间、每一缕春光。

河流、山川、湖泊、田野变得生动起来。

春雨湿沃土，滴滴育翠绿；细雨打枝头，花开果满熟。春雨预示着一年的好光景。春雨婆娑，洒下禾苗拔节的希望；细雨缠绵，落下枯市逢春的渴盼；细雨蒙蒙，洗净尘世的铅华。

春雨是无私的，从天空中来，奉献给大地，却不带走什么；春雨是恩泽的，默默地滋润，给干裂的寸土无限生机；春雨是热情的，浇灌沃土，不图回报；春雨是温馨的，令人的心生无限的惬意。

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春之时在于雨啊。于是，辛勤的人们开始忙碌起来，乡间的脚步也快了起来。

听，春雨沙沙，浇灌我们心中的期待。和风细雨的春天，流多少汗水就有多少收获。

看，春雨蒙蒙，飘洒万种风情，世界生动而活泼。新叶催开花蕾，万物吐故纳新，明媚的春天在美丽绽放。

春雨随着人们的欢声笑语、辛勤耕耘而至，人们在春雨中融入春天的主题，带着美好的向往、目标和愿景向前。

(二)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春天里的万紫千红，像水墨粉彩画，淡淡的，悠悠的，柔柔的……春之神韵，没有夏的艳丽，没有秋的素洁，更没有冬的冷峻，独树一帜，妙不可言。春是浪漫的，春是繁华的，春是起点，春更是希望。

春天一到，那些被风霜袭击过的草儿、树儿，悄悄地开始吐露新叶，一片，一片，然后，不经意地的，就绿了窗外。那么清幽，那么娇嫩，那些在严冬里积蓄了一身力量的花草，终于迎着春日的笑脸，舒展了身子，

笑开了花。

花香，一阵阵地弥散开来，沁入肺腑。迎春花首当其冲，仿佛箭步冲在前面的运动健将，将大红的、粉色的花朵儿开得绚烂非凡。它急急地奔来向我们报告春的信息，在微风中翩然地摇动身姿，好像在说：“春来啦，春来啦。”茶梅花娇羞地藏匿在繁茂的枝叶间，小小的身子紧紧地裹着，似乎酝酿着给人惊喜的小心思，生怕一不小心泄露了秘密。春风一吹，桃花、杏花、梨花……仿佛一夜之间全开了，那甜蜜的、醉人的花香，飘在空气中，萦绕心头。

这醉人的春。

百花尚且争先恐后地为了春天开放，何况我们这些有着中国梦的有志之人？

你听，有孩童在歌唱：《春天的故事》；

你听，有人在颂赞：《你好，春天》；

你看，春日里孩童们尽情地阅读，肆意地奔跑；

你看，高高的脚手架上，强壮的建筑工人正在昂首劳作，修建城市里美丽的楼宇；

你看，宽阔的马路上，环卫工人正在低头清扫落叶，将道路维护得整洁如新；

你看，那些高知识分子，正绞尽脑汁为月亮车献计献策；

你看，还有那些保家卫国的英雄儿女们，正在精神勃发地驻守边疆，随时准备为国效力，贡献生命……

每一个人，为了这春天，都在竭尽全力奏响激昂乐章。

每一个人，为了这春天，都在努力散发自己的光和热。

每一个人，都在这美丽的春天努力，不辜负这春光的美意。

为了这春天，我们愿意付出一切。

我们愿意倾尽所有的力量，只为了在这春天，跳出一支完美的舞蹈；

我们愿意付出所有的努力与汗水，只为了不辜负人生的春天，给生命划一个圆满的句号；

我们愿意贡献一生的时间与精力，只为了祖国的春天，只为了中国繁荣昌盛，盛世吉祥。



布拉格的两张名片

文 自由撰稿人 王晓宇

那天去图书馆，我又看到了那本书——《春天去布拉格》，细腻的文笔，仿佛把人带入另外一个天地，恍惚之间便有了错觉，伏尔塔瓦河、查理大桥、布拉格堡、平卡斯教堂——浮现在眼前，一块砖，一块瓦，一片落叶，一朵野花，都带着浓厚的人文色彩和艺术气息。

作者笔下的城市、河流、大桥、教堂，处处都透露出历史的沧桑和深邃，那种艺术而唯美的笔调，令人不由自主地走近了另外一个陌生而遥远的异域，内心充满向往和想象。

“布拉格”这几个字充满浪漫、诗意、想象、美好、魅惑，也因此一度成为小资的代名词。因为在布拉格这座神秘而且充满人文色彩的古城里，随时可以品尝到香味浓郁的土耳其咖啡，可以观光卡夫卡的旧居，可以去歌剧院听歌剧，可以欣赏捷克式的市器，当然，也可以什么都不干，享受一下阳光和城市风情……

布拉格是一座精致的古城，纵然是炮火，纵然是坦克，纵然是战争，纵然是毁灭，历经两次世界大战，它都得以完好的保存。对于这样一座人文、历史、文化、艺术，点点滴滴沉积着震撼人心之处的城市，命运也会有所偏爱。

很多人喜欢布拉格，不仅仅是因为布拉格有灿烂的阳光，神秘的古堡，庄严的教堂，罗马式、歌德式、文艺复兴式的建筑物，以及波西米亚人的浪漫和热情，更因为布拉格出了一位天才作家卡夫卡。读过《变形记》的人几乎都会记得那个变成甲壳虫的人那伤心孤独的情感历程。

这位生前默默无闻、辞世后才声名远扬的大作家，

成了布拉格的代名词，成了世界各地许许多多文学爱好者心中的不能攀越的高峰。他的代表作《审判》、《城堡》、《美国》也为很多人所熟悉。提起布拉格，人民很自然地就会想到卡夫卡。提起卡夫卡，人民很自然地会想到布拉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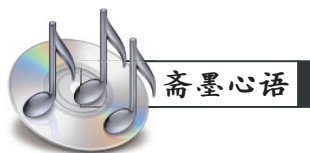
布拉格还有另外一位作家，那就是米兰·昆德拉。看过电影《布拉格之恋》的人都知道，这部电影是根据米兰·昆德拉的小说《生命不能承受之轻》改编的。我喜欢这部小说，最初看这本小说，还是从小弟手里借阅的，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藏书迷。

米兰·昆德拉的另外一本书《生活在别处》也非常畅销。他的小说深奥难懂，语言富有哲理，小资们从他的书中看到了迷惘和感伤，愤青们从他的书中看到了人生思考，而我从他的书中，看到了自己心中对布拉格的向往。

曾经在网上看到一句话：去布拉格前的必做功课，就是读米兰·昆德拉的小说。当然，这只是一家之言。无论是卡夫卡还是米兰·昆德拉，提起布拉格，人民都会想到他们。他们的名字已经和布拉格这个古城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是布拉格最生动的两张名片。

心情不好的时候，小抑郁来袭的时候，在琐事中不能抽身的时候，我都会不由自主地念叨这句话——春天去布拉格，仿佛这几个字，会给我力量和安慰。或许因为这句话在我的思维中已经变成一种意念之类的东西，只要想起这几个字，就会想到另外一个画面，和平、春天、野花、美丽的城市、明媚的阳光……心中的阴霾便会一扫而空。不需要行动，只需要在心中默念，只需要心随意动，生活就会变得美好和灿烂起来。





读书时代：2013十大法治图书

◆《出没风波里：江平和他的时代》

作者：陈夏红，法律出版社

该书是2010年那部江平口述自传《沉浮与枯荣：八十自述》的姊妹篇，通过对江平的家人、同事、朋友、学生等的采访，引用许多文献资料，以新闻的方式告诉读者“江平和他的时代”故事。

◆《我们律师》

作者：张思之，法律出版社

作者张思之说：“在思想上不惧不媚、自爱自重，关键是时时、处处都牢记‘我是律师’而绝不由此后退半步……”这样的自觉和自信，足够证明，中国法律人已经开始迈入一个“阅历较多，体会渐深”的时代。

◆《刑法格言的展开》（第三版）

作者：张明楷，北大出版社

除了比旧版本增添了300余条法谚，第三版的诸多内容作了大量修改，其中又以案例的解读最为精彩。新案例给大陆法系的法典注入了活力，但其与时俱进的解读又能在古老的法谚中找到依据。将其对刑法格言的解读列入学术专著目录，是因为本书任何一个章节抽离出来都不失为逻辑缜密的学术论文。

◆《谁来守护公正：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访谈录》

作者：〔美〕布莱恩·拉姆等著，何帆译，北大出版社

在此书中，美国最高法院9位现任大法官与3位退休大法官首度全体出境，畅谈司法理念、决策内幕与个人经历。从这里看政府如何维护司法公正，看法官如何捍卫宪政法治。

◆《坐待天明》

作者：许章润，广西师大出版社

许章润教授有众多头衔，属于理论法学界少数的几名跨界学者之一，而为经济学界、社会学界、政治学界共同接受。《坐待天明》也是跨界之作，记录了一位学者对良治的期许，更记录了许多苦闷和无奈，皆为真诚的发声。

◆《我们人民：奠基》

作者：布鲁斯·阿克曼著，汪庆华译，政法大学出版社

该书讲述了美国宪政的发展历史。通过作者的讲述我们会发现，现代美国政府并不是在1787年的那个“神奇时刻”一蹴而就的。恰恰相反，它是两个世纪以来不断斗争的产物。

◆《斑马线上的中国：法治十年观察》

作者：邓子滨，法律出版社

从测谎仪到摄像头，从安检到城管，从示众式审判到因言获罪、跨省追捕，法治十年可谓筚路蓝缕。此书看似法律读物的启蒙版，骨子里却是法律人呼唤制度文明的振聋发聩之音。

◆《法律后面的故事》

作者：梁治平，广西师大出版社

该书记录了作者参与两件国际公约的制定、目睹和亲历国际法律制造机器的运作过程；并讲述了名誉权案、流浪法庭案、虐猫案等诸多案例在法庭幕前幕后的法律展演，对于隐藏在法律仪式后面的社会规范，及促成这种规范的理念、思潮和行动都有极为细致的观察。

◆《善与恶：税收在文明进程中的影响》

作者：查尔斯·亚当斯著，翟继光译，政法大学出版社

如同作者所言：“税收是文明的比价……愤怒的纳税人可以成为建立压迫性税收的政府的致命威胁。”即便是专门针对税法的论述，也深深与法治、民主、人权与社会共识密切缠绕，吸引着法律人的眼球。

◆《民主的奇迹：美国宪法制定的127天》

作者：德林克·鲍恩著，郑明萱译，新星出版社

该书是德林克·鲍恩关于1787年在费城召开的联邦制宪会议的经典史传，这场激辩不止、富戏剧性的会议缔造了不朽的政治文献——美国宪法。而这部宪法，造就了当今法律体系最为发达的国家。

（此榜单由《法治周末》首次以投票方式产生；来源：360doc个人图书馆网）

【数字】

2.3万

2013年全国律协首次发布的《中国律师社会责任报告》显示,全国共有2.3万多名律师担任各级政府部门的法律顾问,约占律师总数的十分之一。其中,1300余名律师担任省部级政府部门的法律顾问,8100多名律师担任地市级政府相关部门的法律顾问,14000多名律师担任县级政府相关部门的法律顾问,基本形成了省、市、县三级政府法律顾问的工作架构,确立了较为稳定的服务模式和服务领域。

25.2万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25.2万执业律师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助推法治中国建设,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截至2013年底,全国共有1343名律师当选县、市、省和全国四级人大代表,有3790名律师担任各级政协委员,全国律师办理各类诉讼案件248.53万件,办理非诉讼法律事务64.59万件,承办法律援助案件35.51万件,担任企业法律顾问近50万家。

78%

2013年,全国律协贯彻落实司法部《关于加快解决有些地方没有律师和欠发达地区律师资源不足的问题的意见》,会同各地司法厅(局)、律师协会,采取多种措施解决少数地方没有律师和欠发达地区律师资源不足的问题。目前,已有136个县解决了无律师问题,占全国174个无律师县总数的78%。其中,已全部解决8省县域无律师问题,实现了律师事务所及律师县域地区全覆盖。

【关键词】

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

近期,最高法院下发通知,要求上海、江苏、浙江、广东、陕西5省市部分法院进行深化司法公开和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的试点工作。试点工作主要目标是建立符合司法规律的审判权运行机制,优化配置审判资源,严格落实独任法官、合议庭、审判委员会的办案责任,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需求,提高司法公信,树立司法权威。此项改革将于2013年12月正式启动,为期两年。

裁判文书公开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要求从2014年1月1日起,符合条件的法院生效裁判文书应当在互联网全面公布。除涉及国家秘密、个人隐私的、涉及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以调解方式结案的、其他不宜在互联网公布的4种不得在互联网公布的情形外,法院生效裁判文书应全面公布。同时该规定明确,中国裁判文书网作为各级人民法院文书上网的统一平台。

内地与港澳律师事务所联营

近期,司法部正式批准广东开展内地与港澳律师事务所合伙型联营试点。根据试点方案的要求,在广东指定的区域内,内地律师事务所与香港(或澳门)律师事务所可实行合伙型联营,以联营律师事务所的名义对外提供法律服务,承担法律责任。联营律师事务所采取特殊的普通合伙形式设立,只能受理承办民商事领域的诉讼、非诉讼法律事务,不得受理承办涉及内地法律适用的刑事诉讼、行政诉讼法律事务。

【声音】

“当前许多地方参与立法的主体可以加大改革创新力度,进一步增强代表性,不能只是专家学者或者是行政机关公务人员;立法信息的反馈和收集渠道也有待拓展。立法机关应该进一步深入到一线普通群众中去,尤其是和立法密切相关的群体中去,才能做到有的放矢、更能代表基本群众意见的立法。”

——黑龙江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杨振宏

“要解决信息泄露问题,首先是在源头加强安全防护,不断修补网络漏洞,降低信息外泄的可能性;其次是完善保护个人隐私的法律,制定并不断完善‘个人信息保护法’。有了一部专门的法律,才能明确监管责任,才能明晰企业处理个人信息的边界和责任,也才能让贩卖个人信息者罪当其罚。”

——上海政法学院社会管理学院院长章友德

【业界前沿】

中山：初试将仲裁纳入公共法律服务项目

中山市律师协会与广州仲裁委员会中山分会签订合作协议，今后双方将共同参与构建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目前，中山市711名律师中，共有33名律师担任广州仲裁委员会的仲裁员，占全市律师人数的4.36%。根据协议约定，中山律协与仲裁会将在培训交流、业务合作、信息共享等三方面加强合作，以达到共同参与构建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的目的。将民商事仲裁服务纳入构建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在全国尚属首创。

太仓：力推公共法律服务均等化

根据太仓市出台的《太仓市公共法律服务均等化规划(2013-2015)》，到2015年，太仓市将建成基本完善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截至目前，太仓市已设立全国首个公共法律服务专项资金，金额120万元，为百姓购买法律服务，并在全省率先成立集法制宣传、人民调解、法律服务、法律援助等功能于一体的实体化、综合性的市级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形成了覆盖城乡的公共法律服务网络。据悉，此为全国首个关于推进公共法律服务均等化工作的规划。

山西：律师服务新增计时收费形式

自2013年12月1日起，山西省将在全省统一实施新的《山西省律师服务收费标准》。根据新的收费标准，律师服务收费依旧保留计件收费形式，实行政府指导价和市场调节价。新的收费规定较大幅度提高了收费标准，增加了计时收费的形式，并开始执行分段按比例累加收费形式；此外，新的收费规定设定了三年的有效期限，该规定对诉讼案件的审级(阶段)划分更细更便于操作，也规范了风险代理收费标准。

宁波：法官和律师共建职业共同体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宁波市司法局、宁波市法官协会和宁波市律师协会联合召开“加快法官与律师共建法律职业共同体”主题新闻发布会，并会签《关于加快共建职业共同体的倡议书》和《关于加快共建职业共同体的合作框架》，探索新阶段新时期法官与律师良性互动关系，加快共建法律职业共同体。为推动《倡议书》和《合作框架》的具体落实，四家单位还制订了任务分解方案，具体确定了牵头单位或部门，确保责任到位，抓出实效。

云南：建立律师参与职工信访接待制度

云南省司法厅、省总工会联合下发文件，建立律师参与职工信访接待制度。律师通过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参与信访接待、代理诉讼或非诉讼法律事务、提供法律援助等方式参与职工信访接待工作。此举为广大律师服务职工群体提供更加完善的工作平台，有助于进一步发挥律师法律服务的职能作用，引导职工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帮助信访职工和农民工群体解决实际困难，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江西：推出“QQ律师接待平台”

为规范、高效接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江西省检察院案管办积极推行“一站式”接待服务，开创性推出互联网“QQ律师接待平台”。通过该接待平台，律师可以和全省三级检察院的案管办取得网上联系，实现全省三级检察机关案管部门互联互通。此举为营造和谐的检律关系搭建了一个效率与互信的信息化平台。该接待平台专人全天候网上接待，为律师办理阅卷、递交相关材料等有关事项提供咨询、预约服务。目前，律师基本实现5分钟内阅卷，2小时内完成案卷。

江苏：律师服务收费标准调整

江苏发布了新的《江苏省律师服务收费标准表》，对不同种类的诉讼案件分门别类规定了收费标准，律师的收费不能超过标准范围，如果超过就属违规；而重大、疑难、复杂诉讼案件以及提供其他法律服务的收费，则实行市场调节价。其中，计件收费、按标的额比例收费，仅仅适用于简单案件。而计时服务收费及收费标准则适用于全部的法律事务，但必须征得委托人同意和认可，并按照收费规定执行。

温州：首推律师信用等级评定

为促进律师诚信执业，维护法律尊严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温州市律师协会出台了《温州市律师执业信用管理办法》并开展了温州律师执业信用等级评定活动。根据该办法，律师执业信用等级由低到高依次分为C级、B级、A级、AA级和AAA级5个等级。其中，C级为严重失信律师；B级为失信律师；A级、AA级、AAA级为诚信律师，执业信用状况分别为较好、良好、优良。每年一次的律师执业信用等级评定，其结果将被录入律师执业档案。

1

一流法治城市建设重视发挥律师作用



2014年2月19日，市律协会长张勇、副会长蔺晓青、郑德刚，理事马学平、肖寒梅、顾东林，监事刘军一行到市政府法制办拜访。市政府法制办主任王璞、协调处处长蒋小文、文件审查处处长黄祥钊、法务处副处长王峻、研究所研究员丁明高接待我会一行并座谈。

张勇会长简要介绍了我会近期的工作并希望政府在推进政府购买法律服务、普遍建立法律顾问制度等方面给予支持和指导，为律师业发展开拓空间。

与会律师围绕政府购买法律服务、普遍建立法律顾问制度提出建议：一是统一市区两级政府购买法律服务的标准；二是提高政府购买法律服务的意识，推动各级政府及各部门建立法律顾问制度，充分发挥律师的专业优势；三是将购买法律服务纳入财政预算，为完善政府购买法律服务机制提供经费保障。

王璞主任指出，深圳律师业发展历史证明，律师是建设一流法治城市的重要力量。市政府法制办非常重视发挥律师的作用，将积极推动以下几项工作：一是把“进一步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推动普遍建立法律顾问制度”列为2014年法制办工作要点，建议政府出台文件，推动各级政府、政府各部门设立法律顾问；二是法制办各处室审查法律法规及相关文件时，将征求律师协会及律师的专业意见，进一步提高政府依法决策、科学决策的水平；三是拟由律师协会推荐金融、房地产、公司法等方面的法律专家，提高律师在专家库中的比重，凝聚多方智慧为政府服务。

2

深圳市律师协会成立25周年暨老律师座谈会召开

岁末年初，市律协召开深圳市律师协会成立25周年暨老律师座谈会。市律协各届会长、副会长、执业25年以上老律师等近40人出席座谈。东莞市律师协会秘书长陈玉伦、副秘书长卢锦仪应邀参会。市律协会长张勇、监事长张善华、副会长郑德刚、部分理事及青年律师代表陪同座谈。会议由蔺晓青副会长主持。

座谈回顾了深圳律师业的发展历史，就律师行业自律管理、民主建设、律师事务所管理、律师业务推广、律师业发展方向等进行交流。历任会领导及老律师肯定了八届律协的各项工作，并希望八届律协做好行业历史传承，紧

抓前海开发机遇，推进律师业信息化管理，为深圳律师业发展搭建广阔的平台。

张勇会长感谢历任会领导、律师前辈对我市律师业发展做出的贡献，并简要介绍了八届律协的重点工作，表示八届律协将带领全市律师推动深圳律师业取得新发展，并希望与会人员对律师业发展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

经八届律协第十一次理事会审议决定，会议授予陈野、黄明根、徐建、李淳“深圳市律师协会名誉会长”称号，授予王和平“深圳市律师协会名誉监事长”称号，授予原福田区司法局局长谷廷兰“支持律师业发展特殊贡献”奖，授予黄思周、郭星亚、郑剑民、蔺晓青、陈治民、方壮毅、徐建、陈学明、段毅、钱伯明“深圳律师业发展杰出成就”奖，并向在深执业25周年（以上）的60多名律师授予纪念牌。

3

我市5名律师获聘“深圳市人大常委会立法咨询专家”

2013年12月19日，深圳市第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议聘请26名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立法咨询专家。我市张勇、张丽杰、林昌炽、童新、于秀峰律师获聘为首批专家。

立法咨询专家库首批专家由三部分专家组成，具体

包括：法律专业专家；财政经济、城建环保、科教文卫、社会工作等领域专家；语言文字专家。此举旨在充分发挥专家的智囊作用，进一步提高市人大及其常委会法规审议工作质量。

随着近年来我市律师参政议政工作的深入推进，律师在建设一流法治城市中的作用进一步突显。此次律师担任“深圳市人大常委会立法咨询专家”，将为我市律师积极参与社会和政治生活提供更畅通的渠道和更广阔的平台。

4

深圳律师学习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
宣讲报告会召开

2014年1月10日下午，深圳市律协党委和律师协会组织召开深圳律师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专题宣讲报告会。市律协党委、纪工委委员、理事、监事、律所党支部书记和律所主任等200余人参加。会议由市律协党委副书记张善华主持，深圳大学法学院院长黄亚英教授应邀做专题宣讲。

报告会围绕十八大之后的司法改革前沿问题，从律师行业新形势与困境、审判权的定位与属性、司法公正的正确解读与理解、司法公开与裁判文书上网和律师行业发展面临的三大关系等五个方面展开重点讲解。就新时期律师工作，黄亚英教授提出：一、律师要关注当前司法改革后为律师行业带来的福音；二、律师要积极参与重点领域立法，积极推进司法公开、推动裁判文书上网，充分学习和运用中国特色的案例指导制度，指导律师执业；三、要正确处理好与社会、政府、法院及外国律师的关系，为律师行业的发展打开出口。

5

2013年律师参与法治城市建设
成效显著

2013年，我市律师认真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工作者的职责和使命，参与我市法治城市建设成效显著。

一是服务党和政府中心工作，积极参与公共决策。2013年，我市59名律师担任省、市、区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交“两会”提案、议案、建议112件，为基层维稳综治建议1007宗，5名律师获聘“深圳市人大常委会立法咨询专家”，为政府、企业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

二是充分发挥专业优势，维护社会和谐稳定。2013年，我市律师代理各类案件83061件，涉及财产标的额472.07亿元，解答法律咨询109771人次，代写法律事务文件47778件，参与信访值班2754人次，参与调解案件6982宗，协助基层化解矛盾纠纷4931宗。

三是延伸法律服务触角，推动基层法治环境建设。设立法律服务联系点563个，律师法律进社区2406人，律师参加法律义务咨询53782人次，免费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46473人次。

四是积极投身公益事业，履行社会责任。市妇联律师志愿团38位律师总值班316人次，接待来电来访644批次；律师办理法律援助案件21178件，参加捐助助学、为希望工程捐款、参与扶贫救灾捐款等公益活动累计金额逾330万元，深圳前海律师专家服务团、深圳图书馆律师志愿团、“1+1”法律援助志愿律师、龙岗律师公益服务团等公益律师活跃在社会各个领域。

6

2013年市律协举办专业讲座、
培训五十余场

2013年12月30日，市律协召开专业委员会总结会议。市律协张善华监事长、梁建东副会长，舒卫东理事、李慧、高立明监事，15个专业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和监事会绩效考核委员会委员参加会议。会议由业务发展和职业培训委员会副主任梅臻主持。

截止2013年12月31日，各专业委员会累计组织讲座、研讨会、沙龙等培训活动51场（次），现场参加律师6200余人次。2013年，各专业委员会在业务培训形式和内容方面大胆创新、勇于突破，通过整合跨专业、跨

领域、跨行业资源，联合开展业务培训活动，扩大深圳律师影响力；通过论文征集、案例汇编等方式归纳、总结相关业务领域实务经验和理论成果，彰显深圳律师业务素养。

李慧监事表示，通过各专业委员会对本年度工作情况的介绍，监事会对各专业委员会的工作有了一定的了解，监事会将按照《深圳市律师协会监事会绩效考核委员会工作规则》，结合各专业委员会的工作总结进行考评。

梁建东副会长代表市律协感谢各专业委员会对协会工作的大力支持和辛勤付出，希望其今后再接再厉，继续推进各项工作。

闲谈偶记

文 特约撰稿人 沙鸥

偶然闲谈
我们任由话题一路逶迤——

是的
可想见
当夜色晨曦交融
晨星寥隐时现 悬在浅色天边
静寂里 农人仨俩蹒跚 荷锄归去
田舍如剪影 草木疏落芬芳
追忆滋味绵长

是的
可知道
无论生活怎样砥砺
人渐圆熟 褪了青涩
心底依然 留着柔软角落
每沐清冷月色
流连波光滟影
一圈圈漾开 皆是欢喜

是的
可觉到
历史厚实
世相万千变幻
轮回里的感动与震撼 快乐与忧伤
总是联结着内省和成长

文字竞相追逐
在内心的疆野里纵横
金戈铁马 裂帛穿云
铿锵着壮怀激烈

简单的心 简单地生活
但 我们仍在物质的现实里呢
日日碰撞着
是什么振翅远去了

闲谈的午后
任思绪如天马
疾驰田野星空
倾盖 一时如故



法無定法由心證
律有規律書為凭

弘揚法治理念 彰顯律師精神

國浩盧北京書於癸巳年冬

